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4月15日第9期 总第21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9期

【专稿】

乔晞华 从疯狂、理性到情感：社会运动学简史

【研究】

李清崑 关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讨论

——论《矛盾论》中的“生产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倾向

印红标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

何與懷 个人崇拜加速度——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个历史考察

【书评】

小 鹰 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

——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一章最后一节

【怀人】

叶维丽 陈小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14年北京老三届的文革道歉与反思

【文摘】

罗点点 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人生观教育

周泽雄 乔治·奥威尔：带齿轮的想象和无所畏惧的理性

【封面】

邹 行 天堂之门

【读者来信】

1. 小鹰答余汝信 2. 郭世杰正误：杨忠立的籍贯不是固城县，是城固县

【本刊声明】

【专稿】

从疯狂、理性到情感：社会运动学简史

乔晞华

社会运动学 (Social Movements) 是一个因中国的文革而兴起并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一直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直到上世纪的 60 年代，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还很少¹。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从 1968 年 5 月开始，西欧和北美出现了类似中国红卫兵的青年和学生造反浪潮。这一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欧美大陆，使得各国政府措手不及。该现象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兴趣，对其研究开始增多。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学逐步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²

社会运动的定义有许多版本，这里不妨采用威尔逊 (Wilson) 的定义：“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

³该定义包括了两个重要的信息：“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如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后者拥有正常的管道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

社会运动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时间性、认同性和目标性。⁴群体性的意思是说，社会运动是为实现社会变革的群体和组织的努力，不是个人的无组织的努力。时间性指的是社会运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与强有力的对手进行一定时间的斗争，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议活动或较量。认同性指的是社会运动的成员不仅仅是在一起工作，他们还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目标性指的是社会运动通过抗议等活动试图改变社会。

¹ Killian, Lewis. 1964.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ed., by Farris, Robert E. Chicago: Rand McNally, pp. 426-445.

²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137-198.

³ Wilson, John. 1973.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 8.

⁴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范围两个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可以分成四种类型¹：

表1 社会运动的分类

| | 变化有限 | 变化巨大 |
|-----------|------|------|
| 变化只涉及一部分人 | 替代运动 | 救赎运动 |
| 变化涉及整个社会 | 改革运动 | 革命运动 |

因篇幅关系，我们在这里只讨论与文革研究有关的两种社会运动：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将矛头指向现行的制度，他们只是认为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大多数的抗议事件和社会运动均属于此类运动，其目标是改革社会的某一部分，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有体制。革命运动旨在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并创立新制度。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前者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后者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运动。

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它的前身——群体行为学 (Collective Behavior)。早期的学者研究群体行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受了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的杜尔凯姆 (Durkheim) 的影响。他的社会平衡观念对早期的社会学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群体行为学的研究重点是社会组织的不自主性、冲动性和即时性。研究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守法的人变得不守法了？”学者们对群体行为的参与者是否理智、是否有自我意识持否定态度²。该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 (Gustave Le Bon)，代表作是 1895 年发表的《乌合之众》 (The Crowd)。我把这一理论称之为“乌合之众论”。勒庞认为是聚众使人的思维转变，使人失去平常的判断力，人在聚众中变得疯狂。³该派理论家的目的是为精英控制聚众，反对激进派。⁴需要指出的是，华人学界中流行的“一个文

¹ Aberle, David. 1966. *The Peyote Religion Among the Navaho*. Chicago: Aldine.

² DeFay, Jason Bradley.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ttp://www.weber.ucsd.edu/~jdefay/sm.htm>.

³ Le Bon, Gustave. 2001/1895.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⁴ Reicher, Stephen, and Drury, John.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4.

革说”是“乌合之众论”的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学说。“一个文革说”认为，造反派是“疯子”，逍遥派是“傻子”¹，亿万群众卷入文革是因为“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运动中民众被迫作出抉择；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²简言之，民众参与文革是盲从、不明真相。坚持民众是非理性的“乌合之众论”淡出研究领域已有近50年了³。该派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东山再起，笔者不敢妄测，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新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再也没有谁敢把民众说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利益诉求、任人欺骗的傻瓜是不争的事实。⁴

对“乌合之众论”持批判意见的理论家很多。马克思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社会运动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⁵马克思注重社会冲突，关注经济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变化的经济状况与群众运动有着反向关系。⁶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状况下降变糟，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就会上升增加。反之，如果经济状况上升变好，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会下降减小。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常被称为“社会冲突论”。社会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社会运动。只要资产阶级掌握权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换言之，不断的剥削是革命的动力，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假设是，有共同利益的人必然会组织起来追求共同利益。⁸华人学界中“两个文革说”是马克思的“社会冲

¹ 陈子明。2006年/2014年。“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今天》第74期2006年（秋季号）。《昨天》第28期2014年1月。

² 席宣、金春明。1996/200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367-368页，2005年版，第319-322页。

³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13.

⁴ 乔晞华。2015.《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湾博客思出版社。

⁵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Barker, Colin and Tydesley, Mik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 1. <http://eprints.nuim.ie/460/>.

⁶ Barrett, Kimberly and Lynch, Michael J.. 2015. “Social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22.

⁷ Smelser, Neil.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4.

⁸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突论”的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学说。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简称 RCT）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崛起。

¹这是基于微观经济理论的学派，受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等人的影响，²属于自由个人主义传统，以个人为主导，强调个人作为群体行为的重点。³该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奥尔森（Olson）和奥普（Opp）。在该派理论学者眼里，社会运动是适合外境的追求政治目标的方式。⁴奥尔森不认同马克思的关于个人会为共同利益自动参加运动的观点。该派学者认为社会冲突并不自动导致社会运动。他们认为运动的参与者是经过权衡利弊，面对各种选择作出自利的决择。理性的个人不会行动起来实现共同的利益。⁵个人只有获得利益才会参加公会、参加运动、参加革命。运动需要有措施实现“不参加就没有个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理性的人都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不会为他人的利益工作。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免费搭乘客”问题。该理论强调个人作为群体行为的重点。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简称 RMT）试图通过分析个人理性地权衡参加运动的得失来理解社会运动⁷。在有些情况下，社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增大、人们的剥夺感上升或者人们怨恨的增加，而是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增长了。是否参与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进行的理性选择。资源包括知识、财力、传媒、人力、合法性、社会精英的支持等。如果对社会不满的群体能够动员手中掌握的资源，运动就能发展起来⁸。该观点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群体能够组织起来开展社

¹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22.

² Mahmoud, Abdesse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May 2015, pp 8-20.

³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ay/sm.htm>.

⁴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22.

⁵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⁶ Mahmoud, Abdesse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May 2015, pp 8-20.

⁷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ay/sm.htm>.

⁸ McCarthy, John, and Zald, Mayer.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May 1977), pp. 1212-1241.

会运动，而有的群体却无法组织起来的原因。该派的学者认为，对于社会运动的动员来说，资源比不满更重要。¹资源动员论试图寻找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用的组织性资源。²

理性选择论和资源动员论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是孤立的，而后者承认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实现群体的理性。理性选择论反对情感化，认为情感总是不理性的。而资源动员论绕过了这一关，认为出于情感的行为也可以是理性的。在相互依赖的语境下，仅靠个人的理性不足以达到争取利益的目的。³

有学者批评资源动员论太注重内部的因素，而忽略了外部因素，即政治机会。这就产生了“政治机会论”（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ory）。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运动依赖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只有在政治环境有利的时候，社会运动才会出现和成功。后来，有学者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太死板，该理论演变为“政治过程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简称 PPT）。⁴这一理论深受马克思的影响，⁵事实上是外部的资源动员论。政治机会使社会运动得益或受阻，通过影响更广泛的机会使得社会运动成功。⁶泰罗（Tarrow）总结出四种情况会出现有利的政治机会⁷：一、挑战者有机会进入国家政体；二、精英重新站队；三、精英分裂；四、镇压挑战者的能力和倾向有变化。政治机会也可以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受欢迎程度和脆弱程度。如果现行体制比较脆弱、不堪一击，社会运动很容易发生⁸。总之，是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政治机会。⁹

¹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22.

² 夏瑛。2014.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社会》第34卷。52-74页

³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⁴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⁵ Mahmoud, Abdesse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May 2015, pp 8-20.

⁶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ay/sm.htm>.

⁷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⁸ Tilly, Charles.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97-317.

⁹ Gamson, William. 1975. *Strategy of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⁹ 夏瑛。2014.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社会》第34卷。52-74页

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前者强调内在的因素，而后者更强调外部的因素。虽然两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强调社会运动是一个过程，强调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¹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属于宏观层次的理论，都强调物质性的条件，没有考虑非物质性的因素，如文化和情感。

以上的理论是北美学界发展的。在欧洲大陆上，社会运动学的发展采取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新社会运动理论”²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简称 NSM) 是由欧洲的三位思想家，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法国的阿兰·图赖讷 (Alain Touraine)，和意大利的阿尔贝托·梅卢西 (Alberto Melucci) 提出来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的交锋中发展起来的。该派学者认为，社会运动成员再也不是自动地产生于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社会运动成员需要重新发现自己、创造自己、使自己形成新的群体身份。这是人们常说的“身份认同”。该理论试图解释北美和西欧 60 年代中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该时期的社会运动有别于旧形式的运动，所以被称为新社会运动。

新社会运动强调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不再强调劳工被资本家剥削，不再强调收入，而强调生活、身份、环境、性别、和平、反战等。³这是因为社会冲突在欧洲仍很重要，但又不同于旧的产业工人运动，⁴例如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这些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它们涉及的范围。由于现行政府的政策是全国性的，如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所以运动的范围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如反核能运动)。该理论融汇了欧洲 19 世纪以来的杜尔凯

¹ 赵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
<http://oa.shxyj.org/UploadFile/20130926008/2015-08-23/Issue/xq3ebfdi.pdf>

² Melucci, Alberto. 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pp. 199-226.

Melucci, Alberto.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No. 4, pp. 789-816.

Offe, C.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pp. 483-99.

³ Smelser, Neil.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4.

⁴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Volume 22.

姆、马克思和韦伯 (Weber) 三大社会学传统，体现了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¹传统的社会运动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它们大多数致力于经济斗争，而现在的新社会运动则跳出了经济范围，因而得到更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以上的理论均忽略了意义制造 (Meaning Making)。这是因为这些学者们认为群众与观察者不同，他们的意义制造不理性。例如，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觉悟是他们与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在调查工人状况时只关心事实，并不关注工人的态度。他认为群体行为是可以从客观指标中读出的，即工人最终会如马克思本人那样理解他们自身的状况。²文化主义者从社会心理角度关注个体微观动员机制。运动的动员是文化现象和话语活动。每个运动的动员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实践，传递意义实现动员。³这就是“构框理论” (Framing)。该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家贝特森 (Bateson) 在 1972 年提出的。⁴它是这样定义的：一种简化与浓缩“外在世界”的诠释架构，通过有选择地强化与符号化一个人的现时的和过去的环境中的对象、情况、事件、经验、行为顺序⁵。社会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提出一套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以便唤起民众加入运动。受压迫的民众受到压迫，并不一定视其为不义而采取批评或抗议行动。没有新的解释构成群体的共识，社会运动不易兴起。简言之，构框是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寻求旁观者的认同和支持、以及降低反对者的动员效果”为目的。⁶群体行为的理性决策是在互相依赖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互相交织在一起，之间的关系有道德和情感的投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的关系网络的一个部分，⁷所以构框理论也可以视为是情感和网络。

构框与意识形态不同，构框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不义，意识形态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

¹ 赵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
<http://oa.shxyj.org/UploadFile/20130926008/2015-08-23/Issue/xq3ebfdi.pdf>

² Kurzman, Charles. 2008. “Meaning-Making in Social Movement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81, No. 1, pp. 5-16.

³ 夏瑛。2014.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社会》第 34 卷。52-74 页

⁴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⁵ Snow, D. A. and Benford, R. D. 1992. “Ma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 by A. D. Moms and C.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137.

⁶ Gamson and Modigliami, 1989; Snow et al, 1986; Snow & Benford, 1988; Benford, 1993a.

⁷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38

义是重要的¹。民众对现实情况的理解来自于自身的经历、周围的人群、媒体的广播以及某些权威机构的宣传等等。社会运动则致力缔造另一种的解释来影响民众。学者把这种另类的解释称作为“群体行动构框”，是鼓动民众采取行动的动因²。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营造气氛，使更多的民众行动起来参加运动。尽管存在反叛意识，存在可以利用的资源，政治机会的条件也具备了，有的时候运动却不能成功。这是因为虽然反叛意识、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很重要，但是如果民众没有充分地形成与运动组织者相同的意识，运动的动员仍有困难。以下表格是对上述理论的一个总结（括号内是代表人物）：

表2 社会运动学理论的分类

| | 非实利主义 | 实利主义 |
|------|-----------------------|------------------------|
| 古典理论 | 乌合之众论（勒庞） | 社会冲突论（马克思） |
| 宏观理论 | 新社会运动论 (图赖讷、梅卢西) | 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 (蒂利、泰罗) |
| 微观理论 | 理性选择论/博弈论 (奥尔森、奥普) | 构框理论 (贾斯珀) |

上述的社会运动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乌合之众论”（疯狂）；第二代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有“社会冲突论”、“理性选择论”、“博弈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和“新社会运动论”（理性）；第三代是构框理论（情感/网络）。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学经历了从疯狂、到理性、再到情感/网络的螺旋形变化，使我们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¹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94.

² Snow, D. A., Zurcher, L. A. And Ekland-Olson, S.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pp. 520-532.

【研究】

关于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

——论《矛盾论》中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倾向

李清崑¹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在1981年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大会发言的基础上,经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充实写成的。不论在内容和篇幅上均有较大的提升。

文章的基本内容是对《矛盾论》里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矛盾论》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来”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作者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倾向。作者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论证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而且在实践上由于无视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经济基础实际状况，单凭领导人的主观意愿，一味地推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直至发展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发展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群众饱受祸害。作者指出，这一理论观点，乃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系列左的错误和路线的哲学基础。

一

时光倒流三十七载。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1981年，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北京原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召开。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会的有我和另一位教师。彼时，在中央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理论界空前活跃。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年会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展开了热烈讨论，基本上做到了各

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八十七岁离休教授。

种不同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讨论和论争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关于《矛盾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的争论尤为热烈，引人关注。《矛盾论》里写道：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对于《矛盾论》的这段重要论述，与会者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意见认为它不仅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而且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矛盾论》的上述论断应做具体分析，它既包含正确的内容，也包含着错误的倾向。大体上说前一个“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即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正确的；而后一个“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则包含着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用的错误倾向。笔者持此观点，并斗胆就此问题向大会提交了长篇论文。¹

大会成立了领导小组，其成员为何方人士，事隔三十多年，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和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负责人王正萍。

会议的最后两天为大会发言和举行闭幕式。关于《矛盾论》那段论述的讨论，共安排了四位代表发言。或许是大会实际负责人的倾向使然，四位发言者为3:1。即坚持《矛盾论》该观点正确的共三位；而认为该观点包含错误倾向的只有笔者一人。在笔者的记忆中，前三位发言者论述较为系统的是第一位，他以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包产

¹ 该论文二人署名，由本人执笔并为第一作者。

到户等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革论证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第二位发言者则试图运用系统论来论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大意是说，从第一层次即最高层次来看，应表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而不应说起“决定作用”；但从第二层次即较低层次来看，则应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至于何为第一层次，何为第二层次，为何第一层次不起“决定作用”而第二层次则可，大概因笔者系统论知识浅薄，未能听懂。不过笔者认为，承认在最高层次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起反作用而不应表述为“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可取的，故在大会发言时强调：哲学的概括从来都是最高层次的概括。至于第三位发言者所讲的内容，至今已无印象了。这里必须说明，笔者虚度八十七载，记忆力大不如前，加之手头又无相关文字和录音材料，故对上述发言的追述恐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笔者的大会发言则主要是宣读提交会议的论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较为深入地论证《矛盾论》上述论断所包含的错误理论倾向和实践危害。

发言者各述己见，相互之间未有交锋。亦未因对《矛盾论》上述观点的质疑而出现“扣帽子”、“打棍子”之现象，倒是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实在是久违了。

会议期间，《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对笔者进行个别采访，主要是详细了解我对一问题的思考过程和基本观点。

此次大会结束后大约二十来天的光景，某日忽然接到了一通传呼电话（彼时除系领导与极少数名流外，一般教师家中无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解放军政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史唯，早在延安时期就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听了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录音，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欲登门拜访，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闻听此言，方知对方是一位老革命，连忙说道：您是前辈，不敢劳您的大驾，还是我前往拜访为好，请定时间，并示尊址。史唯同志说：你家距政治学院很远，往返要二、三小时，很不方便，我有车，比你跑一趟方便多了。说罢便询问我家的详细地址，约定明天上午来访，不由分说。次日上午约10时许，史乘一上海牌小轿车光临寒舍。见面后，方知史唯同志是一位独臂将军。落座后，稍事寒

暄便直奔主题。他除了向我介绍参加革命的经历外，重点询问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他说看来你对此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你的大会发言从理论上论证的比较清楚，而他则从实践上对这一观点的危害考虑得更多一些。接着他便从实践的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听来颇受启发。最后，他提议是否可就此问题共同研究，合写文章。由于考虑到这一问题属敏感领域，对方又是军界人士，加之自己又不愿高攀前辈，故对合写文章之事婉言推辞。史见我面有难色，亦表谅解，即不再提合写文章之事。之后，史询问了我的经历，我直言相告。又聊了一会儿，他便起身告辞。

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哲学界流行一种被人们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发展的权威观点，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观点。此种观点出自《矛盾论》。这一观点被引申为：仅仅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还不是彻底的辩证法；只有肯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才能彻底坚持辩证法，避免机械论。

当时，笔者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中加以宣讲和论证。但是，随着对马、恩原著的深入研读，随着对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沉痛教训的反思，笔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便对这一所谓的权威理论观点产生了怀疑：它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呢？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呢？

经过一番较为深入的探究，笔者认为是后者而非前者。

第一，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原则界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诸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里“决定”一词是有其严格的规定涵义的。所谓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¹他又说：“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²这些论断都是讲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指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上层建筑则是由经济基础派生的，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³这些论断讲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所有社会形态共同存在并始终起作用的普遍规律。他们之间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改变和不可颠倒的；否则，就会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当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不是消极的、被动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也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但是，这种作用，从性质上说只能是“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和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作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把二者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更不能相互混淆，本末倒置。

不可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其强弱、大小乃至性质和方向，会有很大的差别。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就非常之强烈、非常之明显、非常之巨大；而当适合于生产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² 同上，第4卷325页。

³ 同上，第2卷82、83页。

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非常之强烈，非常之明显，非常之巨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是这样。但是不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多么强烈、明显和巨大，仍属于“反作用”范畴，而不是属于“决定作用”范畴。这种反作用，从性质上说，同决定作用是不同的，不论它多么强烈，多么明显，多么巨大，也不能改变其反作用的性质，也不能称之为决定作用。那种认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观点，从认识论上说，实质上是没有弄清楚“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原则区别，而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反作用”看作是“决定作用”，以不同条件下反作用的量的差异混淆了“反作用”同“决定作用”之间的质的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历来都十分重视后者对前者的作用。但他们总是从“反作用”的角度去看待和讨论问题的。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提法。被邓小平誉为“一字也不改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不仅没有沿用上述提法，而且强调“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这就严格划清了“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界限，实际上是对《矛盾论》上述观点的否定。

第二，上述观点还包含着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无条件性的错误倾向。

只要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此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起不起决定作用呢？如果说它们还起决定作用，这里无疑就同时存在两个“决定作用”，这不仅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势必导致“二元论”之错误。如果说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

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时候，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就不再起决定作用了，那就直接了当地否定了这一“决定作用”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无条件性，这是此类观点自身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可以这样认为，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实际上就意味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不起决定作用了。这岂不是直接了当地否定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无条件性吗？

这里有必要谈谈“一定条件”的问题。所谓“一定条件”，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一定条件”，也可以是主观任意设定的“一定条件”。从我国建国以来自土地改革之后二十多年来所搞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所谓变革来看，多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来进行，而是单凭领导人的主观任意性为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十年文革。何况，即便是如《矛盾论》所论述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也只能说在此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不应得出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结论。

第三，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说成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实质上是极大地夸大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任其发展下去，必定导致“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其思想根源则是“唯意志论”。建国以来之所以屡犯左的错误直至给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此乃重要理论根源与哲学基础。

在笔者看来，如果把话说得再透彻一些，那么，只要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因为，既然承认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当着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

立之后不维护它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维护新的生产关系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无异于说，不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时，它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岂不把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变成为在任何条件下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了吗？

当有人以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去论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观点的正确性时，这一夸大生产关系作用的错误倾向就更加明显了。他们认为，我国建国以来多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均证明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当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实行土地改革变更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土改之后，实现农业合作化，变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建国初期的七年国民经济之所以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造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是由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此后，经过三年调整，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证明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样的论证，原本是为了说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殊不知这样一来却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既然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起伏与成败均由于生产关系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不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呢？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又表现在何处呢？上述论证据单个分开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把这一连串的论证联系在一起，夸大生产关系作用的错误倾向就十分明显了。这样的论证，很难避免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论断导致在任何条件下均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逻辑结论，也很难避免导致“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结果。

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之所以屡犯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革“十年浩劫”祸国殃民的大祸害，从理论根源上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外，另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夸大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背离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些左的错误倾向，首先表现在脱离我国实际的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一味地推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由逄先知、金冲及任主编并经党中央审定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册记载：1952年底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亮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¹然而，这个宣传提纲墨迹未干，领导人便急切地在城市大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来预定15年完成的任务，在不到1年的时间即宣告胜利完成，过早地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大地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错误倾向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最为典型的就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半年之内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据《毛泽东传》上册835页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8月29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加写了一段话：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可完成，有些地方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更有甚者，据陆定一回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同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¹ 《毛泽东传》上，第2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重点是作者加的。

¹就连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上述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们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同上书，第827页）。一时间，在全国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说什么“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见龚育之、郑惠、石仲泉等人编写并经中央权威人士审阅批准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号召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荒唐的时尚。实践无情地证明，脱离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与状况，主观任意地推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遭到惩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颇为留有余地并含蓄地承认：“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²实际情况是这类一意孤行的主观任意性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使上千万人被饿死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这一极其沉痛的教训，值得人们世世代代永远记取。

这里要提到的是，笔者所在的北大哲学系的广大师生，当年曾亲身经历了这一瞎折腾的过程。自1958年8月25日至1959年5月底，经北大党委批准，哲学系的全体师生包括冯定、冯友兰诸多老教授，还有当年冯定指导的前苏联研究生米沙及1956级的五、六名越南留学生，统统下放到北京市大兴县芦城乡参加社会实践，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老

¹ 《毛泽东传》上，第826页，重点是笔者加的。

² 同上书，第845页。

教授们和外国留学生提前返校）。广大师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热情投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也亲身见证了“大跃进”是如何吹牛皮、瞎折腾的。当时正是小麦播种季节，上级根据领袖审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指示必须“深翻密植”。所谓“深翻”，就是要求翻地要达到一米之深；所谓“密植”，就是每亩播麦种必须比往常多四、五倍。据说这样才能亩产达万斤，“放卫星”。老农们私下议论：“掘地三尺，把生土都翻上来了，能长庄稼吗！”但开会时无人敢吭声，否则要被“辩论”（此为彼时彼地之流行语，即被批斗之意）。当冯定的研究生米沙到笔者所在的生产大队参观“大放卫星”吹嘘“亩产万斤”的试验田时，连连耸肩摇头，表现出大不以为然的模样。同时，大家也亲身见证了人民公社是如何一哄而起，一夜建成的。公社成立后，大刮“共产风”，较为典型的就是大办公共食堂，实行社员“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过共产主义好日子”。北大师生也同在公共食堂吃饭。当地盛产小占米，据食堂管理员告诉笔者，每个壮劳力仅一顿饭就要吃掉大米二、三斤。他悄悄地说“照这个吃法，要不了多久就把队里的粮食吃光了”。果然，当1959年冬至1960年春，包括笔者在内的哲学系部分师生重返该地参加人民公社的“整社”运动时，公共食堂已缺米下锅，不得不搞“瓜菜代”了。农民因饿肚皮面有菜色，私下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在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状况，一味地凭主观任意性搞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脱离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状况与要求，一味地推行上层建筑的所谓变革。发展到极至，便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路线，使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达十年之久，使国民经济遭到空前破坏，面临全面崩溃的绝境。

上述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的错误作为，必然遭到党内外的抵制和反对，必然招致广大群众的不满。怎么办呢？妙招是有的：高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利剑，“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发动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对反对、不满和怀疑者加以围剿和镇压，以阶级斗争作为“杀手锏”，强制推行极左路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无穷的祸害。

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¹对于这一理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和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革命的原义和转义混为一谈，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还去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结果不仅没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使‘天下大乱’持续了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²这一解说，主要是从政治层面着眼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其实质乃是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以阶级斗争为纲开路，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与状况，脱离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凭领袖的主观任意性，随心所欲一味地变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达到建立带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十九世纪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毛泽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希图建立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则不仅毫无进步意义，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只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十年浩劫就是最充分、最有利的证明。

三

有一种意见，认为《矛盾论》的上述论断并未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意思；这层“意思”是读者读出来的，是读者的误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矛盾论》里头的那段话明明白白写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

¹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条。

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637页。

的作用”，这一“决定的作用”怎么成了读者读出来的呢？

有人为了论证《矛盾论》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援引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话：“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形态，决定着统治者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页）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尽管在具体表述形式上和“一定条件之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但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它可以作为后者的理论依据。

但笔者认为，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上述观点的理论依据是难以立足的。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加以使用的，他认为特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人们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既然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决定性的反作用”，那就仍然属于“反作用”范畴，它有别于“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以上重点为笔者所加）。其二，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并未附加任何条件，也就是说它并未以“一定条件”为前提，因为“反作用”，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有的，它不需要一定条件为前提。既然如此，那么硬说马克思的话与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完全是一个意思，岂不是违背了马克思的意愿吗？其三，如果说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所说的“决定性的反作用”真的同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作用”观点完全一致，又何言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为了论证《矛盾论》上述观点的正确性，有人还援引恩格斯晚年致布洛赫信中的一段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为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

有上层建筑的多种因素……”。¹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肯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意思。首先，判断恩格斯是否提出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必须把他致布洛赫的信同他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紧密联系起来全面地考察，而不应只抓住一两句话，割断其前后联系，断章取义，更不应主管臆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为了澄清庸俗经济决定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在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和强调生产关系尤其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即便如此，他们在用词上也还是相当严谨的。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讲到上层建筑作用的地方有十几处之多，他所使用的均为“反作用”、“相反的作用”、“反过来起作用”、“重大作用”、“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影响”、“反过来影响”、“第二性的作用”等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486、474、484、485、506页）。而从未使用过“决定作用”或“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之类的概念。这说明恩格斯即便在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时，也始终是把这种作用严格限定在“反作用”范围之内的。其次，恩格斯在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时，仿佛预见到有人会夸大它的作用，所以，他总是反复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他一再指出。在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时，决不能忘记“经济因素”，“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它“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起着“支配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是“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4页）他写道：“尽管其他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²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无条件性。再次，不仅从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看不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¹ 《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

² 同上，第506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观点的影子，就是单从他致布洛赫的信来看，也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的那段话所强调的是上层建筑诸因素“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而不是说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如果作这样的解释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恩格斯在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写下的一段重要文字则相当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创造我们的历史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¹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指出上层建筑诸因素“也起一定的作用”，但他却强调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我们不是把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割裂开来，而是联系起来理解，那么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得不出他肯定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结论。

这里要说明的是笔者的上述意见决不是说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依据的观点就不能成立；如果一切都“唯马恩”，那么马克思主义岂不成了教条，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呢。笔者的意见只是表达了一点想法：为了牵强附会地论证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种观点的正确，硬到马恩那里去找寻理论依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理论上造成混乱。

四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所出版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和论著中，已很少见到《矛盾论》上述论断的踪影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肖前、李秀林、汪永祥教授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不再引用和论证《矛盾论》的上述观点。这两部书，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推荐为高等学校哲学系本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材。

¹ 同上，第4卷477-478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李秀林、王于、李淮春教授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也不再引用和论证《矛盾论》的上述观点。该书为原国家教委指定为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哲学通用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亦向《矛盾论》的上述观点挥手告别。该书在讲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时，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大的反作用”；在讲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时，则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得极为突出”，但它“终究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发生的。”（参看该书第307、339页）均不提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黄枬森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陈晏清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同样也拒绝了《矛盾论》的上述观点。该书的几位主编和编委陶德林教授（武汉大学原校长）以及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主编韩树英教授均为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量级专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赵家祥、李清崑、李士坤教授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新编本）》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也拒绝了上述观点。前者获北京市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后者为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此外，还有不少重要教材和专著对此亦持相同态度。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笔者阅读的范围有限，或许还有某些教材和专著依然坚持上述观点，大概为数也不多了。

以上情况说明，哲学界的许多学者对《矛盾论》的上述论断之见解逐渐趋向一致。

《矛盾论》是毛泽东论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哲学著作，在我国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干部和群众都是通过学习《矛盾论》进而了解唯物辩证法的。笔者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从中获益匪浅。在这一重要哲学著作里，毛泽东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唯物辩

证法的诸多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给人以启迪。但《矛盾论》也同毛泽东的其它著作一样，并非“句句是真理”，也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本文以上列举之论断即是一例。正如对毛泽东本人不应迷信一样，对其著作亦不应迷信。

毋庸讳言，哲学界对《矛盾论》的上述观点是有不同见解的，这是正常现象。有不同见解是好事，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讨论乃至争论，可促进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与了解。《矛盾论》和毛泽东的其它理论著作一样，既是人们的学习对象，又是人们科学研究之对象，不论是学习对象还是科学对象，人们均有权对其作深入研究、探讨与评说。 ■

2018年元旦，定稿于北大燕园

【研究】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

印红标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文革中达到空前的狂热，几年后又被要求“降温”。在升温和降温的背后，是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政治作用的操控。本文尝试分析个人崇拜如何被用来发挥政治工具的作用。

一、领袖崇拜与党崇拜

个人崇拜指人们对在任的政治领袖的神化和崇拜，不仅对其政治权威性和正确性、并且对其思想和理论深信不疑和崇拜。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当局只允许崇拜，不允许不崇拜，更不容忍质疑或批评。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已出现个人崇拜的初步倾向，

取得政权之后逐步形成个人崇拜。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的初期，对党的领袖的崇拜是对敌斗争、整合党内力量和争取民众拥戴的手段。具体地说，是以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抗国民党和蒋介石。1970年，毛泽东在与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说：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要树立一个人啊。”¹这段话似乎是说，树立个人崇拜是为了党的事业，但是实际上，个人崇拜一旦形成，领袖就势必凌驾在政党之上。

1956年苏共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度在中共引起重视。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显然没有成为党内的坚定共识。毛泽东不愿放弃对他的个人崇拜，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和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为个人崇拜重打开大门。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²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混淆了崇拜真理和崇拜领袖的差别，提出崇拜真理就要崇拜领袖，而在中共党内就是要崇拜毛泽东自己。

毛泽东一经提出，就有一些中央领导人随声附和，其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话最为极端：“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³

1959年8月31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他赞扬毛泽东并

¹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北京，第498页。

²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2页。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说：“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¹

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方面不遗余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59年，林彪接替主持中央军委之后，强调突出政治工作，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军队展开(似应改为“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雷锋是战士的先进典型，也是崇拜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榜样。雷锋因公去世之后，林彪为其题词：“全军同志都应当(此处加“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毛主席语录》，发给官兵。林彪为新版《毛主席语录》题词，抄录了雷锋用于自勉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²在这里，解放军战士效忠的对象，从党向领袖偏移。

林彪吹捧毛泽东的很多话被反复引用，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³

林彪在军队倡导的突出政治等方针，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军队的作法被推向全国。到文革之前，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也将毛泽东捧为大救星、北斗星、红太阳。

1964年国庆15周年，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3000多人参演，作为中国革命颂歌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毛泽东为主轴展开。新创作的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广泛传唱，文革期间成为造反派受挫折，期盼毛泽东支持时常唱的歌曲。大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对毛泽东的称颂无以复加：“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

¹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²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1960年10月20日根据林彪指示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的一句话。后来雷锋将这段话抄录在日记里。雷锋去世后，其日记经整理后发表，广为人知。新版《毛主席语录》出版之前，林彪接受编辑人员的建议，抄录了这句话，作为题词。但是，只抄写了前三段。

³ 《人民日报》，1966年1月25日。

闪耀着你的光芒；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你的身旁。”“我们伟大的导师，我们光辉的榜样，我们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跟着你奋勇前进，让胜利的红旗永远飘扬！”¹

1964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应邀观看了《东方红》，他写下了对个人崇拜的不安：“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在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想到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²

文革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在全党、全国盛行，但总体上与对共产党的崇拜并行不悖。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党的正确性也被神化。伟大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³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相辅相成。产生于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毛泽东颂歌的《东方红》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段也要歌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1966年文革前夕，河北震灾区的民谣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然而，对党的崇拜与对领袖的崇拜仍然有着微妙的差别。共产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按照组织原则，领袖由中央集体选举产生，向集体负责。集体领导理应是常态，但是领袖的个人崇拜必然打破这种应然状态。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不满，不愿受中央集体的制约，而要驾驭中央集体。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政治体现，是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及其领导权力。他们的权威来自党，他们需要领袖也需要党的组织。对党外而言，不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巩固权力，营造对本党领袖的崇拜与对党的崇拜是一致的。而在党内，领袖个人崇拜势必削弱党组织和党中

¹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版。以后拍成电影的《东方红》删去建国之后的部分，包括这首赞歌。此处根据《东方红》1964年版录音。<http://v.ku6.com/show/9AkaUSEqJwjGAkb4.html>

² [美] 埃德加·斯诺著，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³ 毛泽东在世时，“毛泽东思想”毫无疑问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邓小平掌握权力之后，为了政治的需要，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剔除了邓小平认为错误的内容，变为邓小平修订版的“毛泽东思想”。本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指毛泽东在世时的用法，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央其他领导人的权威。毛泽东由党推上个人崇拜领袖的地位，逐渐获得凌驾于全党，以致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威。谁决定谁：是党推出领袖，还是领袖掌控党？这个问题逐渐产生。党的领导干部捧起了红太阳，先是强化共产党亦即自身的权力，但是，接下来，自己也势必会被红太阳灼烤，甚至烤焦——他们更靠近红太阳。文革前，中共党内对此缺少切肤之痛。

二、升温：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发动和操控文革的工具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刘少奇及其政治势力，即所谓斗争“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他的政治理念以及对文革运动的部署是进行这场斗争的核心，对毛的个人崇拜被运用为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工具。

（一）发动文革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不说是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这里透露的信息是：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领导具有特殊的作用，未必得到中央集体一致的赞同。

文革之前的1965年1月，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还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控制不住了。”¹事实上，毛泽东具有左右中央的权力，问题是刘少奇等人并非无保留地支持毛的政策和治国理念，因而毛泽东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用以强化他的权威，赢得党内斗争。

在发动文革运动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高峰。1966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全团对毛泽东思想要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¹ [美] 埃德加·斯诺著，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页。

这就是信仰真理，崇拜革命。”这是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无限崇拜”并宣布：毛泽东思想等同于真理和革命。这次共青团全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久“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改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月4日和5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学师生的文章提到“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和无限崇拜”、“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崇拜”的对象是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久，无限崇拜的对象，除了8月中旬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几篇报道中提到党或“党中央”之外，通常限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战士文章中出现“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于毛泽东思想”，此后，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形成固定套话，即所谓“四个无限”。

与“四个无限”并称的是所谓“四个伟大”。《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发表报道《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称毛泽东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¹由此“四个伟大”形成固定套话。1967年5月，林彪给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题词，使用了这个赞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²

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营造了万众欢呼的个人崇拜狂热场面，象征性地表明毛泽东在政治和思想上赢得了群众，推进文化大革命有了政治基础。

（二）掌握政治和思想的最高权威

1966年6月初群众运动伊始，《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毛泽东思想是“是我们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行动的最高指示，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

¹ 《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² 《人民日报》，1967年5月6日。

微镜。”“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¹在这里，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成为辨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了高于一切权威（包括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最高指示”。这使毛泽东在政治运动和思想领域都处于无以伦比的神圣地位。

埃德加·斯诺对个人崇拜的政治作用有敏锐的观察：“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1965年到现在（1970年，引者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崇拜是成了党的特权阶层的专利品，由它来操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泽东为表面上受尊重的有名无实的领袖呢；还是由毛泽东和他的忠实信徒们来运用，用它来普及毛泽东的教导。普及毛的教导就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人民’，从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在毛看来已成了一个‘新阶级’的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团所领导的篡权者们，并把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夺回来。”²在这里，斯诺已经指出个人崇拜具有夺取“篡权者”权力的政治目的。

文革第一位的任务是党内斗争，毛泽东要完全驾驭党并按照他的意愿整肃党，这就要求毛泽东的权威必须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文革最初几个月，《人民日报》上政治口号的变化，反映了这样的超越过程。

运动刚开始时，通行的口号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作为群众效忠的目标，党中央在前，毛泽东在后。这个排序模式在《人民日报》最后一次出现是1966年9月2日。不久，运动的矛头被引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走资派，口号悄悄变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被放置在党中央之前，这意味着毛主席更有权威。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保卫的对象变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

¹ 《解放军报》社论，1966年6月7日，《人民日报》同日刊载。

² [美] 埃德加·斯诺著，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5页。

级革命路线”，意在强调“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后者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被指控是刘少奇。这是《人民日报》文章最后一次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列。10月27日《人民日报》文章报道的口号进一步变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中央”不见了。以后提到中共中央，通常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为首”是不可或缺的限定语。

在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压倒性的政治话语权，毛的绝对权威击垮了党政组织体系和领导人的权威，毛崇拜压倒了党崇拜。这是毛泽东完成文革目标，打垮刘少奇势力的政治需要。

个人崇拜的强化使毛泽东具有凌驾于中央之上的绝对政治和思想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官僚的利益，从而形成了毛泽东（领袖）—党的领导干部（官僚）—群众的三级政治和社会结构。毛泽东高居于党的领导干部（官僚）之上，党官僚居于群众之上。在官僚和群众的矛盾中，二者都要得到领袖的支持，才具有合法性。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官僚状况的不满与群众的不满尽管基础不同，却共同指向官僚。

文革群众运动的独特之处是抛开自上而下的党政组织体系，由毛泽东和他信任的领导人直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冲击党内当权派，整肃其中违背毛泽东意志的人。这种方式剥夺了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领导权，自然难以被当权派接受。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营造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感到不理解，却往往首先检查自己是否犯了错误，希望能够跟上毛泽东的部署。面对毛支持的造反派群众，党的干部无力反击，只能委曲求全。他们憎恨造反派群众，而不是群众的发动和支持者毛泽东。

对参与运动的群众而言，正是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们对领导干部的不满才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被转变为紧跟毛主席，为毛主席而战的行动。尽管群众得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批判斗争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但是由于运动始终处于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造反运动始终是“奉旨造反”，即依仗毛泽东的支持去批判党政领导人，没有可能变为对抗全体官僚或国家基本制度的反抗运动。

（三）操控群众造反运动的主要工具之一

文革群众运动史无前例地以大民主方式发动群众造反。群众被允许张贴大字报，编印报刊，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举行集会和游行。同时，地方、部门和基层的党政领导体系和领导人不仅失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成为运动质疑、批判的对象。

在这种一反常态的情况下怎样领导运动？文革群众运动中，最具权威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下发的指示或命令、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毛泽东认可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中央的掌握的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文章、以及“支左”的部队。在这之中，有两者至关重要：一是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为首的中央，二是军队。这是毛泽东掌控群众运动的最终手段。

对此，1967年8月林彪的一段话讲得十分明了，他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才敢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¹

处于没有法制、党和政府组织体系瘫痪或半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领导文革运作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没有这个崇拜，就难于从思想和政治上掌控群众运动的方向，而军队及军队中的党组织是武力和有组织的保证。个人崇拜在群众造反运动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它使混乱不致威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使造反运动自我约束，服从毛泽东，保持奉旨造反，勤王运动的特点。群众的自发要求一旦被以毛为首的中央否定，就会在群众内部被压制。例如：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有的工人提出工资待遇等经

¹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94页。

济要求，中央表示反对之后，上海工人造反派率先表态反对这种“经济主义”。

毛泽东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任何人不得对抗。这也是约束直至最终结束群众运动，使文革“从大乱达到大治”的基本保障。

文革中，个人崇拜搞得最极端，最具形式主义特点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66年6月至12月群众运动的发动时期；另一个是1967年夏季之后至1969年春季，群众运动的收尾时期。

在文革之初，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着重鼓励群众“敢革命、敢造反”，反对简单做“驯服工具”，要向当权派“多问几个为什么”，质疑当权派执行了什么路线。这个时候强调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学习、领会和崇拜。

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已经实现，而群众中的派性斗争无止无休的时候，就需要群众运动退场了。要让已经具有自己政治利益的群众组织退出政治舞台并非易事，于是中央强调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强调紧跟毛泽东。1967年夏秋，毛泽东在视察时发出了告诫：“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¹一年之后，毛泽东向武斗不止的清华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召见并训诫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人物。面对毛泽东的威严，以崇拜毛泽东起家的红卫兵和群众造反运动只能偃旗息鼓。

此时崇拜毛泽东的新倾向是：支左军队及工人宣传队推行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早请示、晚汇报、做像章、献忠心等等，直到剥夺群众运用大民主的权利，停办群众报刊，解散群众组织。这个时候个人崇拜的特点是要求无条件地服从毛个人，而不是号召遵循毛的指导去思考问题，去审查和斗争当权派。当时一些学生感到了变化，不很情愿地接受了现实，但激情不再。毛崇拜不仅是发动，并且是结束群众运动不可缺少的工具。

应当指出：毛泽东需要的是能够实际发挥政治作用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化、表面化或惹人生厌的作法。为此，他多次指示不要搞过头的宣传和形式主义，以防

¹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91页。

止反效果。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7月指示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修饰他的思想¹。他几次表示不喜欢“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的提法²。但是，他也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社会上广泛使用同样的提法，显然，这时需要个人崇拜升温。毛泽东还多次要求“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不要讲“空话”，不要“强加于人”。他在审阅文件时，删去“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等提法。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³他在1967年7月，两次批示普遍建造毛泽东塑像是“劳民伤财，无益有害”、“浮夸”，予以制止。⁴1969年6月，对制止一系列形式主义崇拜作法的文件批示：“照办。”⁵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并非否定个人崇拜，而是要避免形式主义和过头的宣传，就是说要使个人崇拜收到实效。只有1969年制止形式主义与群众运动业已结束的情况相关，就是说，开始悄悄降温。

三、降温：当个人崇拜被他人当作工具

个人崇拜被毛泽东用作发动和控制群众运动的工具，却也难免被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

（一）崇拜背后的群众利益

在文革前，群众积累了一些对领导人的不满。文革之中，群众可以对平时不敢触动的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主编：《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第606页。

²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46、68、93页。

³ 同上，第93、148、159、195页。《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13-519页。

⁴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的批示（1967年7月5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01页。毛泽东《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1967年7月5日、13日），毛泽东对《总政、总参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大型毛泽东全身塑像的通知稿的批语》（1967年7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68-369、376页。

⁵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概要，非原文）（1969年6月12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版）。

当权派发泄不满，从而感到自己不必再事事顺从，获得了某种毛庇护下的“解放”感。这是一些民众特别是曾经与领导有矛盾，有怨言，受过打击的民众积极投身运动的动力。在这里，个人崇拜是这些群众发泄不满的依靠。

群众的不同处境也引发对毛泽东崇拜的不同解读。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称：“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

¹他们将个人崇拜当作谋求干部子女“革命后代”特殊权利的护身符。而后起的与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对立的造反派，仰仗毛泽东的支持批判当权派时，有一句名言“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就是说，毛泽东是造反派的靠山，毛崇拜被他们当作合法性的来源，政治的保护伞。文革中群众的毛崇拜，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群众派别兴起之后，衍生出派别及其政治利益的冲突，各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互相斗得不可开交，从文斗到武斗，甚至动用武器。熟知毛泽东语录的各派群众，引用毛语录为自己的派别所用，对毛泽东的指示各取所需，乃至阳奉阴违。中央的决定、通知常常非要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才有权威性。一些管束反派的命令，即使有毛泽东批示“照办”，仍然被置若罔闻。例如毛泽东及中央反复要求“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某些群众组织仍然武斗不止。对毛泽东的崇拜常常被这些群众利用为本派别利益即“派性”服务。

（二）“降温”是对林彪集团发出警号

林彪以吹捧毛泽东著称。文革之初，毛泽东即对林彪的吹捧感到不安。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群众运动基本结束，利用个人崇拜为打倒刘少奇和掌控群众运动服务的需要成为过去，而林彪一派继续用对毛的崇拜为其党内斗争谋求利益，因此为毛泽东所不容。

1970年9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和江青（及张春桥）集团发生了矛盾，这是权力斗争色彩强烈的冲突。林彪一派理论上仍然运用此前吹捧毛泽东的路数，提出：

¹ 清华附中红卫兵：《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2日。

毛泽东是天才，要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当主席），坚持在新的宪法序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曾经使用过的表述，并据此指责张春桥是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此前已经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一派以维护毛泽东为名，打击毛泽东所器重的江青、张春桥一派，严重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高层揭开了与林彪派斗争的序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需要“降温”。他在12月18日会见斯诺，说道：“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¹

毛泽东审阅了这次谈话的纪要并批示：“照发。”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谈话纪要，指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²

众所周知，林彪曾经以“四个伟大”为题词。毛泽东不加掩饰地称“四个伟大”“讨嫌”，并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无疑是向全党吹风：他已经对林彪不满。个人崇拜的“降温”不仅是政策调整，简直成了抛向林彪的石头、林彪失势的预告。

“降温”正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进行，却发生了显然超出了毛泽东意料的事情：党的副主席林彪及夫人、儿子乘机外逃，坠机死亡于蒙古国。全党、全国上下在如雷轰顶般的震惊之后，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一切。毛泽东高瞻远瞩、战无不胜的神话难以自圆其说，对

¹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498页。

²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1971年5月31日，据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版）。

毛泽东的崇拜不仅是降温，而是发生了动摇、瓦解。这首先出现在敏感的青年里面，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但是，直到文革结束，对毛泽东的崇拜在社会上和中共党内仍然具有优势的影响力。

（三）个人崇拜的遗产

文革结束后，在反省文革的过程中，中共党内外逐渐摈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幽灵仍然时隐时现。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共中央随后宣告文革结束。以华国锋为首的一些领导人继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此作为他们权力合理性的来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造了毛泽东纪念堂，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留供人们瞻仰。这是步苏共对列宁和斯大林崇拜的后尘，违背了毛泽东本人签署的死后火化的意愿，是明显地以维系个人崇拜，保证政治权力。

邓小平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要求停止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突出宣传个人的作用，中共中央由此结束个人崇拜的历史。

但是民间仍然存在变相的毛泽东崇拜。在1990年代中国出现对毛的偶像崇拜风，例如：出租汽车司机把毛泽东的像挂在车内，以求保佑平安。这是受到中国道教传统影响。道教常常将历史上的人物神化为崇拜对象，例如将姜子牙（姜太公）、关羽（关帝）、林默娘（妈祖）作为崇拜和祈福对象。

1990年至今出（应删去“出”）时有“毛泽东热”出现，其中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因素。一些在改革中感觉利益受损的群体，一些不满于邓小平改革以来社会不公的人们，从对毛泽东的崇拜中表达其意愿。很早就有人指出：搅动“毛泽东热”就是制造“邓小平冷”。

2016年，5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题为“在希望的原野上”的大型交响演唱会，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的标志性“红歌”为主轴，同时演唱歌颂当今领导人的歌曲，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担忧文革重演，担心新的个人崇拜再现。这个演唱

会最终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告停。

结 论

毛泽东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强化他的政治权威，同时又运用个人崇拜的升温和降温，作为他发动、领导和掌控文革群众运动以及打击对手的工具。

在文革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盛行，毛泽东达到了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地位，但是对毛泽东的崇拜通常与对共产党的崇拜并行。文革之初，个人崇拜急剧升温，对毛的狂热个人崇拜席卷全国，毛泽东崇拜压倒了党崇拜。这是毛泽东发动群众参与党内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系的限制，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打垮刘少奇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需要，也是毛泽东个人驾驭全党，或曰以“毛天下”压倒“党天下”的需要。但是群众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算计。林彪等人则利用毛崇拜谋求自己一派的权力。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要“降温”，是发出了废黜林彪的信号。林彪出逃之后，人们重新思考文革，对毛的崇拜已经不仅是“降温”，而是逐渐陷入动摇与瓦解了。

中国（汉族）文化缺少虔诚的宗教传统，贯穿着实用理性的精神。对毛泽东的崇拜在中国主要是政治的而非信仰的现象，对毛泽东崇拜的升温和降温都被当作政治的工具。■

（本文中文稿为第一次发表。此前，2015年1月本文初稿提交复旦大学工作坊“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文化大革命”。2016年由森瑞枝女士翻译成日文，标题改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崇拜のメカニズ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崇拜机制）发表于（日本）土屋昌明和“中国八十年代と世界”研究会主编：《文化大革命を問い合わせる》（再问文化大革命），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6年11月出版。）

2018年元旦

【研究】

个人崇拜加速度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个历史考察

何與懷

—

1956年2月24日夜，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前一天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演讲，抨击了前任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此后，苏联逐步实行“去斯大林化”。据有关史料，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和指导下，两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重头回应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别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形势一步步走向六十年代的剧变：中苏公开决裂、国际共运瓦解、中国发生文革大灾难。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非常不幸，却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触动毛泽东最隐蔽最敏感的神经。他反其道而行之，让中国更加向左转，把中国推向了一条集个人权力与领袖意志于一体、甚至超越斯大林时代的道路。

当然，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中国国内因素。对于毛泽东，1956年形势大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显赫胜利，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1957）超额完成，他意气风发，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但是，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利用中共“整风”的机会，大鸣大放，向党“进攻”。毛泽东于是在195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消灭任何违逆龙颜的声音；与此同时，他开始公开倡导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作风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快速发展起来。

二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特别强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只能有一个核心”。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在这次南宁会议上可以说是小试牛刀；而1958年3月成都会议就尤为值得注意了——据史料记载，毛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盘公开他有关的整个思考。他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这个成都会议上，即将担任党中央《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后来，在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三

毛泽东把别人反对个人崇拜认定是因为“有个人目的”、“无非想自己独裁”，此言一出，就等于在全党头上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剑，谁如果心存一丝异议也吓得不敢乱说乱动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成都会议上，中共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而且还难以赶上。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调子更高更离谱，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中共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1949年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个人崇拜加速度发动起来了。

于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两个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有之；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有之……等等，不一而足。随后，1958年夏，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军全国取得绝对权威之后，便悍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更加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极度愚昧和狂热，毫不费力就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中，中共“九大”在党章上明文立为接班人的林彪可谓“厥功至伟”。他从毛泽东与彭德怀冲突中认清了毛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按中共史学家意见，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1966年文革开始。林彪在七千人大会把六十年代初大饥荒说成恰恰是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结果。以此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带头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四

这样，经过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在全党全军全国最终居然形成以下这样一些万众顶礼膜拜、视为绝对正确的观念：

例如，毛泽东“天才说”深入人心。林彪说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例如，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例如，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例如，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说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首先提出的，此后又经过各种吹鼓手从历史到现实无数的“论证”和吹捧，被认定为千真万确的历史结论而绝不是一般的头衔修饰。

例如，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毛泽东是当今当之无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占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处在水深火热的民众的希望，是全世界人民心中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他但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甚至枪毙。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五

从1956年到1976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从发轫到高峰的那二十年里，毛先是发动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断的“反右”斗争，继而搞“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最后领导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惨烈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个人崇拜产生的罪恶后果，罄竹难书，好在这已经是众史家的定论，无需笔者在这里赘言。对毛泽东本人来说，这其实也是灾难。他死后家人及大批亲信马上被捉拿被判刑，他自认一生所从事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上被“彻底否定”，他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标志的什么“第三个伟大里程碑”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至于那些个人崇拜鼓吹者们，大多也没有好下场。文革新贵林彪等人是一个类型。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这位曾经被万众敬祝“永远健康”的副统帅，还不是最后落得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的下场？！至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等人，则是另一类。刘少奇一直表现出坚定拥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绝高姿态。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率先提出并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同小可的政治概念，并在延安整风时期鞍前马后为毛泽东效劳，因而在中共“七大”上确定为毛的接班人。1959年8月17日，这位四个月前新鲜出炉的国家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感恩戴德式的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却被毛泽东认定为“睡在身旁的中国赫鲁晓夫”因而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中共不少领导人是有所认识的。邓小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强调集体领导与世代交替的重要性；赞同“少宣传个人”。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发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的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后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作为国策，邓小平倡导“开放改革”，把毛“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颠覆为“突出经济”。他的思路是：首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便会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六

这里不讨论邓小平最后作为中共“核心”的功过，就说他上述的思路也算是个美好的愿景吧，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甚至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轨道。最具讽刺意味的

是这个历史事实：毛泽东个人崇拜是在1956年发轫，而恰恰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参加过苏共“二十大”的邓小平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敲响警钟般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然而，尔后几十年，这“恶果”就是越来越恶，大家都看到了。

为什么“恶果”越来越恶？因为个人崇拜具有“加速度”。因为风气一旦形成，肯定在全党全军全国，在各行各业，在各级领导之间，出现“比忠比左”浪潮。正所谓“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什么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从言论到行动，都会纷纷出笼。开始可能多少知道不对，多少感觉后果会很严重，但既然大家都搞就一起搞了，而且不搞便难保乌纱帽。很快，在越来越疯狂的攀比中，大家的正常思考能力逐步丧失，都觉得自己在参与一件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这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其灾难还历历在目，这个历史教训还不够惨烈不够深刻吗？！

但是，很难说。

似乎谁都知道，个人崇拜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极其荒谬反动的现象。不幸的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领袖作用”和“个人崇拜”容易混淆，而一些领袖人物，就像毛泽东那样，故意制造混淆，从而无限地强化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这样做？已经有不少论述，从历史根源、社会基础、体制原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等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毛泽东个人崇拜得以形成的复杂原因。例如，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是产生个人崇拜的经济基础；漫长的专制统治传统是产生个人崇拜的政治基础；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忠君思想是产生个人崇拜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中国反专制运动的不彻底性和人权、民主观念的淡薄使各种专制思想继续生长……。的确，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以来，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两千多年，强大的专制思想传统可谓极其根深蒂固，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着或明显或隐蔽的影响。

不过，也应该指出，中国历代皇帝称为天子，自认权柄来自上天，基本上都敬畏上天，敬畏神灵，敬畏祖宗，敬畏圣贤，敬畏历史纪录。有历史学家甚至经过查证，发现中国的

历史文化传统中，在大多数朝代，是没有政治领袖个人崇拜风气的。而当代的毛泽东就不同了，他是按照那位名叫列宁的西方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这个党建原则建立的政党领袖，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导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统帅，他“和尚打伞”，不信天不信地，自称权力来自人民，而“人民”对他不过是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可以轻易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中共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像普列汉列夫所预言的，按照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

因此，如何通过措施和制度设置防范“卡里斯玛”式人物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成了当今政治学的一个比一般反腐败更重要的超大难题——权力腐败是最本质最要害的腐败，而个人崇拜是权力腐败的极致。

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大力主张言论自由，甚至提出制定一个眼下毫无可能制定的《不同意见保护法》。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进行过一次在中共史上绝对称得上非常重要的“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接话后，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习仲勋之忧可谓“中国之忧”；他提出的难题可谓“中国难题”。这个难题实在让人忧虑：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况下，个人崇拜怎么避免？而个人崇拜之风一旦刮起，便会造成强大的加速度，最终后果难以预料！■

（2017年11月30日定稿，为12月2日“十月革命百年祭”研讨会而作。因篇幅关系，本文注释从略）

【书评】

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

小 鹰

《天地翻覆》第一章的末尾有一“简短的结论”。杨继绳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但由于“极权体制”的限制，他一直不能如意，于是“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最后郑重地强调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简短的结论”，也是这本近百万字“文革史”的主旋律。但是，文革的起因果真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自他执政以来，他真的是“好心善意”要一而再三地“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吗？

谁都知道，解放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推行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政策对百姓“横征暴敛”、不给自由，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他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只能描写全国到处是“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连文艺作品都不可以触及社会矛盾^[1]，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1]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无删节本见：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在 62 年“大连会议”上，作家们谈起前几年农村流行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抱怨“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对于这一类的“黑暗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也问到：“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敌我矛盾，象恶霸似的，能不能写？”尽管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要“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可以讨论一下”，他自己仍然认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回避矛盾是不行的。写，是为了克服矛盾，是为了教育人民。”因为他一贯坚信“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这是马恩对于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1]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却遭到了党内和全国报刊的大批判。

作为一个十分老到的政客，毛深知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并娴熟驭政之术。他在野的时候，为笼络人心，会大讲“民主制度”、“舆论自由”，用以反对国民党独裁。他当政之后，便又绝不容得任何批评与异见。从党外人士胡风和章伯钧，到党内同志刘少奇与彭德怀；从“反党小说”《刘志丹》到“替右倾分子翻案”的京剧《海瑞罢官》，再到“隐喻讽刺时政”的杂文《燕山夜话》，哪个逃得过他的“法眼”和掌控？建政之后，假若曾被毛称作“骨头最硬的”鲁迅还活着，也只有“闭嘴或坐牢”的两种选择。毛泽东又何尝容忍过任何敢于揭露“黑暗面”的人？

相反，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1957 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发生了女工罢工。这个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

^[1] 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 1948 年 9 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 4 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 年 4 月第 1 版，175 - 206 页。

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公私合营”后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刘宾雁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可是很快，在毛的领导之下，全国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那时不要说是“工人罢工”了，谁只要是提个意见，或流露一点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不满，就要被打成“右派”，送去“专政”。於是，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道，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

三年大饥荒时还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这些人民起来反对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黑暗面”，毛都让“揭露”了吗？没有。就是在“大连会议”前，党内也有人传达来自高层的讲话“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1]对此，62年8月毛在北戴河中央工

^[1]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作会议上，破口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刮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不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而对付那些起来反对毛路线的民众，毛最拿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手法是，军警迅速到场抓捕，控制媒体滴水不漏，甚至公开“辟谣”否认。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有类似抗议政府或罢工等事件发生，警察也是迅速到场，但只维持秩序，防止肢体冲突，保护抗议者的人身安全。有“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也闻风而至，对当事人拍照采访，当晚就上电视，第二天一早见报，当局却无权干涉。

当然，西方也有政府当局实施暴力，打压媒体的事情发生，如尼克松总统执政的时期。但有法律保障舆论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会屈从政府的淫威，任何人都不可高于法律，总统也不例外^[1]。因此，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里该垮的政府，就垮了，存留的政府继续为公众服务，并受到社会主人——人民的监督。

写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流媒体奉行“黑暗面”与“光明面”并重，且“敢讲真话”的报道方针，其实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的原则：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於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马太福音，5章37节)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书，5章12节)

“真相使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

现在世上一些国家的领袖又在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依法治国”或打压“假新闻”为由，禁言禁声，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

^[1]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2016，(多幅照片)，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

再回到“揭露黑暗面”的选择性问题。杨继绳在该书的导论里宣称：“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他用这一堂皇的借口来掩盖毛派特权和腐败的“黑暗面”，却选择把“官僚”的帽子戴到刘派的头上。

有这样主旋律的《文革史》不就是明显地站到毛派的一边去了吗？ ■

【怀人】

陈小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14年北京老三届的文革道歉与反思

叶维丽



陈小鲁去世，八中同学邀写纪念文字，我在回信中说，会写，“为小鲁，也为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由2014年初的两次会议组成，事关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拱卒”

2013年“8月18号”——一个对我们这代人有特殊含义的日子——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网上登出几张1966年夏八中学生在校园里批斗和强迫老师“劳改”的照片，引起众多校友“震惊和不堪回首”。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在第一时间给同学会秘书长发邮件，表示他当年“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建议校友会安排与老师们开一次会，“郑重道歉”，并

问秘书长：“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回信中陈小鲁还写道：“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们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一连两个惊叹号。

2013年10月7号上午，八位八中老教师和同学会十几名校友代表聚会一堂。陈小鲁在发言中援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第八十九条，强调了对文革的两点批判：违宪和侵犯人权。会上，八中同学在陈小鲁带领下向老师鞠躬道歉，小鲁说：“感谢在座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道歉的机会”。

在座的老师们接受了道歉，场面感人。

消息一经传出，媒体纷纷上门，陈小鲁“一概接着”。一时间，“陈小鲁道歉”成为新闻热点，引发了公众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和争论，小鲁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毁誉不一，以正面反响为主。

陈小鲁后来告诉女附中同学，道歉事在八中校友会网站商议过程中，被媒体挖掘出来，弄得他们很被动，只得大大缩减参会人数；并说，在“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的情况下”，会后仍有大量媒体登门来访；还说，“我的道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八中校友”，但因为“红二代身份”和“老爷子的名头”，他本人受到媒体格外关注，“以老子的职务界定个人重要性是中国的悲哀，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对于这个现实，女附中同学早有领教，并在后来持续领教。

1966年8月5号，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暴力事件（“八五事件”），导致卞仲耘校长惨死。八中老三届同学会2014年初在其网站上称该事件为“中学生在校园中暴戾行为的典型和缩影”，“文革史中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一个污点”。

我对“八五事件”做过一些调查和写过文章，并逐渐与四位女附中同学形成一个“五人团队”，共同调查和思考“八五事件”；同时，有五百余名女附中师生集资为卞校长塑像，过程历时数年，2011年5月12号在学校举行铜像落成仪式。女附中师生做的事并不

为社会广知。

我一直关注文革道歉消息，特别是与我们这代人有关的。如果记得不错，2010年秋，原北京外国语学校一些学生站出来向当年他们伤害过的老师道歉，媒体有报道，但社会反响不大。

我不认识陈小鲁，曾在一套书中看过他的“自述”，他诚恳的态度，反思的精神，80年代后半期参与政改的经历，都给我深刻印象。自述里有一句话——当然不是他说的，但他数次重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开始留意八中道歉事，也读到陈小鲁的媒体访谈。比起前几年外国语学校学生的道歉，这一次北京八中引发的社会反响要大很多。女附中和八中相距不远，就算没有陈小鲁，八中老三届学生的活动也让女附中人关注，更何况这一次它与文革道歉有关。

我冒出了个想法，2013年11月下旬某晚发电邮向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几位女附中同学试探：咱们能否“和八中的人座谈交流一下”，也请其他一些老三届人参加，“谈谈女附中的事，和我们在做事过程中的感受体会”；几天后我又写：“世人对文革的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快50年了，我们能不能超越小小的女附中，作为文革那代人说些什么？”第一封电邮里我没提陈小鲁，当时也没想一定要请他。

那封电邮发出后，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人在波士顿），就看到宋彬彬转来的陈小鲁信：愿意参加。此时女附中同学内部尚未充分通气，开会想法在第一时间捅给了陈小鲁，他马上表态支持，“球”就这样滚动起来了，一发而不可收拾。大家纷纷为开会出谋划策，热气腾腾。四中吴迪同学写了两大篇纸，从座谈会“主旨”的高度谈了看法。吴迪是网上杂志《记忆》主编，过去几年来曾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极大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好兄弟”。提议开会时我心里没底儿，话虽出口，还在犹豫。是陈小鲁毫不含糊的表态让我们没有瞻前顾后，立即进入状态，开始筹备会议。这让吴迪“受到感染”；另一位长期支持我们的朋友印红标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研究者，他也加入了“备会”行列。我们对要不要请媒体很纠结，小鲁提供了他本人的经验和具体建议。后来我们请的三位媒体人中的一位，就是小

鲁推荐的。

这里要提一句宋彬彬。女附中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不仅因为卞校长是文革暴力最早受难者之一，还因为“宋要武”这个文革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虽然我们希望座谈会能够“超越女附中”、提供一个同代人反思文革的难得机会，但女附中的事绕不过“八五事件”，也绕不过“宋要武”。宋彬彬同意在座谈会上发言，并认真准备发言稿。她能够“跳出小我”顶着极大压力一直往前走，离不开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其中陈小鲁功莫大焉。

“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于2014年1月4号召开，《记忆》做了完整准确的报道（第106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主持人——她是负责卞校长塑像的召集人之一——以“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十二字作开场白，它也是会议的主题。此时虽然已经有人赞美文革，但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文革卷土重来，而是严重“失忆”，因此要强调“拒绝遗忘”。包括女附中和八中同学在内，共有十五名同代人出席，其中不乏既是文革亲历者也是研究者的。会场气氛严肃坦诚，陈小鲁的发言再次强调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并说八中校友要“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其他人也做了恳切认真的发言，有位朋友说我们要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研究。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仍言犹未尽，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散会时天色已暗。

今天努力去回想，陈小鲁在会上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和特殊表现，发完言他就静静地听别人讲。都是同代人，彼此没有陌生感，倒有亲切感，特别是为了反思文革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休息期间我和小鲁略做寒暄，没多交谈。散会后人们还聊个不休，我没注意陈小鲁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宋彬彬在回家路上接到陈小鲁“洋洋洒洒”谈感想的电话，他显然受到会议氛围的感染和激励。第二天彬彬给大家转来小鲁一封很长的电邮，里面说“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值得八中学习”——同样的意思，小鲁在会议发言中已有表达；他还特别对宋彬彬说，“要克服心魔，不怕曝光，不要指望人人都会支持你，肯定会招来骂声，但要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如果彬彬站出来，不仅对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义，对全国文革研究

也是一大推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会议筹备过程中有个情况：虽然大家对参会人数把得很紧，怕人多影响“气场”；虽然最后决定请媒体参加，但他们不得发言提问；可是当吴迪提出请几个博士研究生来，并允许他们在会上提问题时，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文革，接着我们做下去。结果是，跟某著名大学现代史研究生一说，没人肯来，盖因做文革研究，一不能发表成果，二对找工作无益。与会的老三届人均已年过六旬，仍以拱卒精神自励，但后继人在哪里？

“再不开就来不及了！”

会后陈小鲁给宋彬彬的电邮中建议：卞校长忌日那天，大家每人献上一朵鲜花，宣读祭文，为卞校长扫墓；小鲁还建议，“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性研究”，把时间段拉长到1968/69年老三届离校时。开过会后，大家都在思索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人提议做道歉网站，有人提议深入思考“17年教育”问题，等等，总之，思绪被激活了，“球”在继续滚动，“推手”越来越多，光是女附中同学就增加了好几位。八中校友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及时报道了1月4号的会议，还郑重其事地加了“编者按”，其中说：“唯有正视这段历史，深刻反思文革对国家和人们造成的灾难，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复兴，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1月8号中午女附中同学在一起总结了4号的会，吴迪、印红标也参加了。之后包括我在内四人去看望女附中金元老师。谁都没想到的是，一个原本的礼节性拜访变成了“策划会”，导致“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在仅仅三天后召开。这一次是老师推动我们，像旋风一般，现场办公，现场拍板。当我们表示希望什么时候也开个像八中那样的会，师生在一起共同直面文革、向包括卞校长在内的所有受到摧残伤害的老师道歉时，金老师说，“要开赶紧开，再不开就来不及了！”我们一下子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老

三届师生见面会”的名字是在场的王老师起的，避开“道歉”两字，让现任校领导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老三届”几个字的含义也许年轻领导不懂，可我们懂，这就是讲文革呀！

老师的积极主动雷厉风行令我们兴奋和激动，文革初期当过女附中学生负责人的同学脱口而出：真是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主持1月4号会议的同学说，这一次咱们开会，在“直面历史 抢救记忆 拒绝遗忘”后面再加上“宽容和解”吧，大家连连称好。这十六个字成了“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的主旨。

陈小鲁不在北京，听说女附中要开会很高兴，在电邮中说，“老师愿意参加，说明公开、正式、隆重道歉的必要性……。祝你们成功！”小鲁还特别叮嘱，“一定要向老师表示集体感谢而不是道歉”，因为“文革并不是人人有错，所以不能人人道歉”。我想他的意思是：他陈小鲁该道歉，其他在文革中负有各种责任的人也该道歉，没有责任的普通同学则不该道歉，但是，对“老师表示集体感谢不可缺！”听小鲁讲话，语调平和，在文字里带叹号，一定是他下笔时怀着强烈的情绪。

吴迪得讯后送来祝愿：“希望女附中12号的道歉能继八中之后，将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推向新高”。这一次我们不打算闭门了，朋友纷纷帮助我们联系各方媒体，这里可以提几家：《炎黄春秋》，《共识网》，《南方周末》。

1月12号的会在女附中校园安放卞校长铜像的会议室召开，会后有很多报道，包括《记忆》增刊（第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一位女附中校友写的博文，报刊文章等，不赘述，只提让我格外难忘的几幅“画面”和几个发言：参会老师中有位正在病中，停止打点滴远道而来，寒风中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被人搀扶着蹒跚走向会场；会议主持人一上来就说，文革过去快50年了，我们都老了，再不开就等不及了；文革中女附中学生正副负责人为没有保护好老师道歉，哽咽不止；“八五事件”中另一位主要受害者、终生须穿“钢背心”的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以两个身份讲话：先说母亲生前对打人学生多次表达过宽容，然后口气一转，几乎是严厉地质问那些“八五”施暴者：你们在夜深人静时，是否曾扪心自问？一位不善言谈的数学老师说，他四十几岁的女儿不知文革，二十几岁的外孙不知文

革，“不应该啊！”会开到最后，两位老学生主动站起来，一位讲了自己目睹“八五”打人现场时的想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另一位说，当年她曾带头批斗班主任，这次会后要登门向老师道歉。

第二天我在电邮中写下感想：“会场充满‘正能量’，是我们这个戾气无处不在的社会久违的。我们能不能做一回‘不知悔改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意识地提倡在‘正视，求实，反思’基础上的社会和解。这次曼德拉死了才知道，其实南非并没有达到种族和解，它只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这个目标大不一样。老师的宽容精神让我们感到他们在继续教育我们”。

会上说要给班主任道歉的年近七十的学生很快就上门拜访年逾九旬的老师，老人非常高兴。

一位没参会的同学称赞会上道歉的两位当年学生负责人：“有勇气这样面对历史的大考”。

另一位女附中学生写来一封长长的电邮，详细回顾了八五那天她目睹的批斗现场，然后写道，“我们那一代学生从未接受过宪法，人权，民主和自由为何物的教育，习惯于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对那么多人被打倒，挨整，即使有点疑问，也不敢说出来，甚至自己都不敢多思多想……我们一定要让未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了解文革，决不能让文革的大悲剧在中国重演”。

鼓励支持我们的，不但有女附中同学，还有许多别的朋友。在重庆的文革资深研究者何蜀由衷地高兴：“这是新年里的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消息。就是应该这样。”

吴迪发来祝贺：“你们的辛苦付出终于开花结果，为女附中的朋友浮一大白！”在紧接着的一封电邮中又说，希望借此时机，促进北京其他中学的道歉与反思。他想到的第一所学校是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是继卞校长之后死得极惨的另一位北京中学校长。正在此时，一位女三中教师的两个女儿主动与我们联系，她们的母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姐姐建议和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慰籍网站”，让新入学的孩子们知道自己学校曾经的历史，也

可以在网上为死难者献花。与此同时，女附中师生在商议可否将8月5号定为“校耻日”，等等。“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很多事情似乎都能做了，也早就应该做了！

陈小鲁回到北京马上后给宋彬彬打电话，彬彬说，“我很感动！”小鲁建议彬彬接受媒体采访。

其实那天会议一结束，就有媒体人坐着不走，拉住我们采访，几个女附中同学你一言我一语说明情况。结果第二天见报时，标题里突出的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我1月16号返回美国，发现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也对道歉会做了报道，主角也是宋彬彬。

二十几位女附中老师不见了，三十几位女附中学生也不见了，一场严肃、认真、感人至深、意义重要的会议，就这样被带点消费味道地介绍给世人。看来无论中外，人们都爱听“故事”，主角是不能换的。

当然也有严肃的媒体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央视某栏目的两位朋友，他们带着录像机以个人名义参会。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看到会议的全程录像，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位见多识广的媒体人，一个一进会场就感到一种令她“震撼”的“气场”，会议过程中“从头哭到尾”；另一个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位女老师面颊上的泪珠，而当听到一位当过兵的男老师曾专程来给卞校长铜像敬礼时，这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就“再也扛不住”了，一面录像一面落泪。

会后这两位朋友继续采访与会女附中师生，深入收集材料，并希望他们所在栏目能够支持他们做的事。未获同意。

会后若干天国内外媒体纷至沓来，有的做了很仔细的案头准备，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幼稚，明显对文革无知，但年轻人愿意知道就好，在京的同学们认真地接待了好几家。

“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

这些媒体是顶着压力来的。很快我们就听说，上面有精神，“不让报道”。想起小鲁说过，八中开道歉会后，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同时，宋彬彬再次成了一些人“拍砖”的对象。宋彬彬不是陈小鲁，难以继续接受媒体采访，但她表示，“我从没说过退出战斗，也没退缩摇摆。”

针对宋彬彬再次被人抓住不放，何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起1968年西南地区的一件武斗血案，因为某人出身不好，当时就把责任栽到他头上，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却多年来无法翻身。何蜀写道，“xxx是因为出身太‘黑’，宋彬彬则是因为太‘红’，都成了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替罪羊”。

小鲁给我们的信也很长：“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不论是支持的批判的，总是看了我的博文吧，总是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吧？总比一天到晚风花雪月好吧？当然这可能有点阿Q精神。可是你想想，那么多八九十岁的老师和同学参加你们的会难道不是最值得的吗？他们对你们的理解和支持难道不是最珍贵的吗？凡事要从不同角度想想，才能保持内心的强大”，“我们道歉不是为了博得喝彩，是为了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宽容和解，你们提的多好呀！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你们的道歉会载入历史……。千万不要沮丧。气可鼓，不可泄，凤凰涅槃，要经受火的考验！”

几天之后小鲁又来了一封电邮，建议我们认真梳理文革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看它“如何排斥宪法和法律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还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忽视这一点，我想你们对此可以写文章。”同时，吴迪也反复讲，“要对17年教育好好反思”。

最近女附中同学出了一套百年校庆丛书，里面包括大量与“17年教育”有关的资料，在一定意义上，女附中人就是在做这件事。

风向变化很快。进入二月份，来自社会（主要是网络）的负面反应已占上风，用一位朋友话说，“你们（女附中团队）挨了一顿铜头皮带”。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铜头皮带”。成为靶子的，不光是宋彬彬，而是“女附中团队”。

老师们对我们的支持一如既往。快人快语的金元老师让人捎话：“咱们办了会，是胜

利。别人拍砖要挺住。爱谁谁！心里无愧。 ”

一位朋友引莎士比亚剧中台词：命该我们遇到这样的时代，让我们迎头以对。

除了攻讦和责难，网络上也有严肃认真的质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答复的问题。这段时间我想得很多，社会上占主流的反响和 12 号会议现场反差太大，让我难以接受，但同时意识到，这次汹涌而来网络舆论告诉我们，“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件“公共历史事件”，我们做的事也成为“公共事务”，比八中更引人注目和更具争议性，用陈小鲁在 2 月初给我们的一份邮件中的话：“越来越觉得女附中文革案例太典型了，48 年了仍在争论发酵”。

大环境对我们不利，我多少有些悲壮感，在给何蜀的信里说，“在国家不‘接着’的情况下，不承担最高层责任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需要出口”，“我们做了，踩了地雷，有点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皆非”，又说，“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帮助激活了中国人的文革记忆。”

我想写一篇回应社会质疑的文章，也算履行我们的“公共责任”。就在这时，小鲁和吴迪几乎同时说，你们该写。小鲁为此一连写了两封电邮，建议我们“不要囿于八五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具体责任”，而要“对八五事件的研究拓展开来，从一天到 48 年，从历史到现实，从感情到理性，从事实到理论，从局部到全局，从道歉到研究，从表象到内涵”。吴迪说，他是我们的“后援”。在我们身后站着的所有朋友中，陈小鲁和吴迪是对我们最有助益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写文章时，心里想着他俩的嘱托。

在北京的女附中同学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策划出书（《远去的女附中》）；并帮助《南方周末》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记者写有关女附中文革的文章。在她们的帮助下，这位记者写出了高质量的文章；同时，一位文革初期挨整的同学在网上一篇篇地写她的“文革纪事”，有大量读者。

我的文章在《记忆》分两期发表（第 112 期、113 期），题目是《活在今天的历史---48

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文章较长，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种种质疑和热点问题，又因为是学历史的，我也对“历史和传说的关系”、“当代人做当代史”等问题写了想法。

我当时想得很多、直到今天还在想的，是在历史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积怨。我们开会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宽容和解”，但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当时有一位学者说，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宽容和解的条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我说，“中国社会这个‘型’在往哪转，没人知道，也许现在还不是寻求‘转型正义’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悔。12号会后当晚，我的一位“忘年交”小友来电话，说你们做得好，“这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我知道，小鲁和那么多朋友支持我们，正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也许，当中国社会具备“宽容和解”条件的那一天，人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故事，里面或许包含着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故事的主角有八中人，有女附中师生，和许多其他朋友，陈小鲁在我们中间，我们曾经共同做过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谨以此文祭奠陈小鲁，并向所有的“我们”致以战友的敬礼。■

【文摘】

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人生观教育

罗点点

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

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卜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过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轻（年）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

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卜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

我们这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在“文革”中被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其实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改变只是更直白，更从字面上接近我们人生观教育的主题——革命。所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从来都

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只有在与革命理想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附带的意义。

所以，当革命狂飙席卷一切的时候，失去生命不仅不会引起丝毫恐慌，反而成为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革命的来临的象征。所以，我的同学们(只因为她们是红五类)做下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为已经不是红五类了，才做了旁观者)对此默默无言，并没有因为这类流血而引起对“文革”的任何怀疑和警惕。谁不承认，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

本文选自 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点点的回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本文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文摘】

乔治·奥威尔：带齿轮的想象和无所畏惧的理性

周泽雄

我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

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

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着；

他虽然有时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

——阿尔贝·加缪

运用无情的清晰这一方式……

——苏珊·桑塔格

乔治·奥威尔从未去过苏联，他大概东欧也没有去过，对“铁幕”的另一边缺乏实地了解，然而，说到对极权制度的理解和抨击，他一个人抵得上一支由罗素、萧伯纳、萨特领

衔的知识分子大军。相比奥威尔认识之犀利、态度之冷峻，那几位当年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知识大鳄，表现出的颠倒错乱足以让人愕然，如伯特兰·罗素，先是昏头昏脑地建议用核弹毁灭苏联（居然用政客而非知识分子的口吻表示“战争的借口不难找到”），后又置大量白纸黑字为无物，矢口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萨特甚至在苏联大规模肃反的残酷事实已为西方世界周知之时，仍淡定地表示：“既然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就没有责任去写苏联的劳动营；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们就可以继续置身事外，不去争论这个体制的性质。”奥威尔的绝笔之一，是一篇涉及反犹主题的批评文章，目标正是萨特“那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时为 1948 年 11 月，而萨特直到苏联 1956 年入侵匈牙利之后，才懒洋洋地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表示：“如果有人想写一部诚实的 20 世纪欧洲思想史，那么他真得有很好的耐力，能忍住别吐。”原因部分在于，当时有那么多著名知识分子热衷于充当“政治上的窥视癖者”，他们“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 145 页）概括有力，唯末句不尽属实。末句反映出这位当代美国学者对极权能量缺乏感触，极权（Totalitarianism）是一种志在全面控制的权力，监狱同样在其掌控之中。胡适 1926 年夏天走访苏联，即对莫斯科第一监狱有过走马观花的考察，并得出了令克里姆林宫满意的结论。（详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 218—219 页）作家严歌苓的半纪实小说《陆犯焉识》写到当年某青海劳改农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农场上下也是做得丝毫不露破绽，犯人训练有素，拾掇出一副高度卫生的环境及一张张向日葵般的笑脸；需要的话，他们还能不在话下地假装自己正在伊甸园里玩耍。犯人弄出的伙食甚至得到了吃遍海味山珍的王子夸赞，他说：

“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厨师厨艺很高。”（《陆犯焉识》第 276 页）

极权的本质是欺骗，欺骗的工具是宣传，宣传的核心是审查，审查的经典意象即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副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审查与宣传是一组孪生关系，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公众舆论》第32页）

当年前往莫斯科的知识界大佬，大多在那片“虚拟环境”前丧失了判断力，我们只听说过极为有限的例外，中国诗人徐志摩意外地荣列其中。声称“不再受骗”的鲁迅先生（他有时通过德文、日文报刊了解苏联），倒是扎扎实实地受到了欺骗，他在发表于1932年6月10日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里写道：

我们不再受骗了！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

逻辑真是糟糕，毫无前提地将帝国主义（实即几个“民主国家”）判定为天生的嫉妒狂，似乎只要看到别人生活得好，就要入境侵略。恰在这一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道命令解散了所有的文学团体；在由劳改犯承担劳力的白波运河工地上，头一个冬天就死掉了十万人；希特勒的纳粹党也在该年选举上台并主宰德国；次年，苏联发生了“人吃人”的乌克兰大饥荒，严重程度不亚于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两者

其实都是人祸。——不过，后人总是容易获得“事后诸葛亮”的优势，我们还是不必嘲笑鲁迅眼光差劲，有这点功夫，不如感叹极权体制宣传能量的强劲和高效。

在那个东西方知识分子整体迷失的年代，乔治·奥威尔成了最大的例外。

在奥威尔成为极权体制最坚定的批评者之前，他的经历、情感和思想走向，倒是趋向社会主义的。不过，是那种更质朴、更注重下层民众利益和阶级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那种只能在当时英国的民主制度上进一步提升的制度，而非将民主制度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与列宁、斯大林嘴里归属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那种社会主义（实为列宁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附带一说，法西斯主义的原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奥威尔日后在《阿瑟·凯斯特勒》一文中曾顺笔写道：“马克思的终极动机可能是嫉妒和轻蔑。”不清楚他想暗示什么，但从口气上也能推断，他不是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威尔从不曾加入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最好简单描述一下奥威尔的生平。在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庄园》写的序言里，奥威尔这样介绍自己：

我于1903年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的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是军人、教士、政府官员、教员、律师、医生等等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伊顿受的教育，那是英国公学中最昂贵和最势利的。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的父亲无力供我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

创办于1440年的伊顿公学，是全英（也许还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精英中学。读奥威尔少年时代从寄宿学校寄给母亲的信，我们发现他学习很好，拉丁语、英语、法语和算术成绩经常名列前茅。然而，他即使凭着奖学金进入伊顿，仍不能保证毕业后顺利进入大学，原因也许正是“昂贵和势利”。所以，为了谋生，伊顿毕业后他带着一口高贵的上层社会口音，辗转万里回到了南亚次大陆，在缅甸当了五年警察，同事多是印度人。通过小

说《缅甸岁月》，人们可以了解其见闻，并把握不大地猜测他的经历。回到欧洲后，奥威尔开始以作家和记者身份从事写作，过着一种底层文字民工的落魄生活。我们在他极富自传性的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里，看到了他的磨难（书中与主人公相关的描述，如高个子、烟鬼、偶尔给报刊投稿等，都与作者的真实身分吻合）。他对洗碗工这一在餐饮业里位居末流的工作知之甚详，书中写到主人公见人横死街头，也仅仅瞟了一眼，三分钟后依旧睡自己的大觉。因为，经受了每天14小时的洗碗之后，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睡觉，哪怕床上爬满了臭虫。在巴黎，作者自称掌握了如何用一先令（即六法郎）过一天的复杂方法；在伦敦，他活脱脱就是一个流浪汉，与整天在街上收集烟蒂的酒鬼厮混在一起，每晚在不同的收容所栖身。看来，这份磨难不完全来自生活的强加，部分是他自找的，他身体力行地品尝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更加坚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信念。奥威尔曾对当年同样落魄巴黎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自传体小说《北回归线》大加赞赏，米勒也对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给予好评：理由不外是，两人都在对方作品里读到了扎实可信的底层经历。

从文学上讲，曾因情色问题而长期遭禁的《北回归线》，成就远远高出奥威尔的试笔之作，今人重读《巴黎伦敦落魄记》，仅仅因为奥威尔后来成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其实，我们不难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感受到作者萌芽中的知识分子激情，小说个别章节，如第36章，几可独立成章，作为一篇针对伦敦流浪汉的独立调查，奥威尔的分析才能、对底层民众的强烈同情心，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的描述和论断又具有克制、严谨的特征——这正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招牌特征。他提出的建议（如在收容站辟一菜地，使流浪汉自食其力）也许较难操作，但听上去合乎情理。

作为中国读者，读奥威尔类似文字，还会伴生一种额外感触：他的处境无论多么糟糕——说实话，只有那些刻意去苦地穷乡从事长期卧底调查的记者，才可与他相比——却懒得表达一点点愤世嫉俗情绪，更没有中国作家通常极难避免的自怨自艾。他不该发点怀才不遇的牢骚吗？应该，但是没有。他素不抱怨，决无中国式穷措大那种反复无常的自轻自贱或自高自大，更不会把自己的流浪生涯假托为某种“体验生活”或“微服私访”，而是

径直把自己看成流浪汉，这有时也会给读者带来困惑。比如，当他在小说第21章就洗碗工待遇问题发表一通围绕阶级矛盾的高见时，当某流浪汉夸口自己有只“罗马鼻子”而他马上联想到罗马皇帝韦斯巴芗时，我们有理由对作者的真身发点嘀咕：你真是流浪汉吗？如作者所言，有些伦敦的流浪汉甚至闹不清拿破仑到底活在耶稣之前还是之后。简而言之，即使在他缺乏知识分子自觉时，他已经形成了视冷静、客观为最高美学的写作偏好。像卢梭那样动辄挪转笔墨，对自己的人品襟怀来上几句感人至深的自弹自唱，奥威尔不屑为之。

使奥威尔由一位普通小说家转型为一名冷峻知识分子的契机，是在他以战士身份加入西班牙内战之后，时为1936年。他在《西班牙内战回顾》一文中写道：“历史在1936年停止了。”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我的影响极大，使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所以，欲评判奥威尔的知识分子写作，最好从1936年开始，具体地说，从他反思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始。

奥威尔告诉亨利·米勒自己要去西班牙时，米勒全然不能理解，认为“这时去西班牙，简直是白痴”。米勒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奥威尔的选择大概与加拿大人白求恩当年来中国延安相似，都只能按个体选择来理解，后人无法从中觑破某种趋势。首先，奥威尔并没有如愿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马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名下一支较为弱势的地方党派武装；其次，奥威尔的军衔只是一名下士，相当于班长，手下仅有12个不太会使用枪械的士兵，后来升为中尉，但相当于英国的少尉，曾一次指挥30名兵士；第三，奥威尔从未置身于重要前线，这使他难以结合切身经历来分析西班牙内战的来龙去脉。他的随军经历缺乏突出性，大部分军旅生涯都相当无趣，只是瑟缩在冰冷战壕里，

整天惦记的不是法西斯，而是短缺的柴火、香烟及永远过剩的虱子（他忿忿地写道：“在凡尔登、滑铁卢、弗洛登、森拉克和温泉关战斗过的人，每个人的睾丸上都叮满了虱子。”）。如此，这本围绕作者行踪展开的书，叙述上就难免凌乱，读者无法追随他的文字来了解西班牙内战的真实过程。好在今天不太有读者对西班牙内战感兴趣（真感兴趣，大可另觅他籍），我们更关心奥威尔的心灵成长，就后者而言，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会不虚此行。

奥威尔几乎没有打过仗。他有过一次夜袭敌营的经历，差点与敌人拼上刺刀，但对方迅速逃走了，所以在奥威尔的半年军旅生涯里，他终究未能完成打死一个法西斯的夙愿。他用英国式自嘲，记录了自己的小小战功：“我抓到过一只老鼠，给了它重重的一击，送它上了西天，可真痛快。”但是，长期呆在战壕里，再加勤于观察的秉性，他照样获得了够多的前线历练，渐渐地，他甚至能发现“每一门看不着但听得见的火炮都有独特的个性”，不由让人想到好莱坞名片《黄金三镖客》里的金发枪手在对头出现时吐出的一句台词：“每支手枪都有它独特的声音。”难道意大利导演瑟吉欧·莱昂内读过奥威尔？战壕里的奥威尔还保持阅读和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日记后来被西班牙军警抄走了），他最终受到了一次致命枪伤，一颗不知打哪儿飞来的子弹，穿过他的脖子。老资格的军医认为，从未有人在子弹贯脖后幸存。奥威尔活下来了，后来连声带也恢复了。这是一个奇迹。

那么，奥威尔到底在西班牙发现了什么，使他得以从此明白“自己的立场”？奥威尔初抵巴塞罗那，见到了如下“着实令人震惊”的场面：

大大小小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每一面墙上都涂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图案以及革命党的缩写标记；几乎每一所教堂都遭洗劫，圣像被焚烧，各处的教会建筑统统被拆毁。每一间店铺和咖啡馆都挂出了告示，声明已归集体所有；甚至连擦鞋匠们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商店的导购员直视着顾客，将他们视为平等的对象。再也见不到卑躬屈膝的言行，

哪怕是形式上的礼节也暂时消失。没有人用“先生”或“Don”之类的字眼，就连“您”也不再使用；大家彼此以“同志”和“你”相称，问候语也由“早安”变成了“祝你健康！”

上点岁数的中国读者，读此会抱以苦笑：那场面太熟悉了，只要把“教会”、“圣像”等字眼略加替换，这番描述完全适用于中国某些特定年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延安。奥威尔记得一名新兵称呼某中尉为“长官”，那中尉惊叫道：“什么！长官？是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文革时期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当铁路工人李勇奇叫参谋长少剑波“长官”时，参谋长也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叫长官，叫同志。”

不过，至少在奥威尔看来，西班牙人非常不适宜扮演《一九八四》中的人物。这是个奔放的民族，富于爱心，疏于纪律，又极度缺乏时间观念（奥威尔发现，西班牙语“mañana”的字面意思是“早晨”，但必须按“明天”来理解），极权体制所要求的高效、冷酷、泯灭自我及机械般的严谨，均与西班牙的民族性构成冲突；此外，西班牙人几乎天生成不了优秀军人。奥威尔在西班牙的经历狼狈仓皇，但他从不曾对西班牙人民有过负面评价，他后来遭到西班牙共产党派出的军警追杀，但他得以顺利逃脱，则与那些军警的马虎素质有关，奥威尔感叹道：“很少有西班牙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要求的该死的效率和一致性。”西班牙军警曾搜查奥威尔住所，奥威尔不在，他的妻子躺在床上，于是，这些看上去训练有素的军警，出于一种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竟从未要求她离开床，以便让他们看看床底下会不会有重要文件或一挺机关枪。这在盖世太保或格别乌的秘密警察看来，肯定是否可思议和不可饶恕的。

西班牙让奥威尔洞悉了极权体制的秘密，活生生的西班牙人却一次没有向他提供例证，他的认识来自对个别掌权人物的远距离观察（他从未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人），以及对几个当年在西班牙活动的苏共官员的有限观察，当然，还包括他最终逃亡时的发现：“当共产主义组织控制的秘密警察镇压马统时，其作法是假定人皆有罪，逮捕了每一个他们能

找到的与马统有过接触的人，甚至包括伤员、护士、马统成员的妻子，有时连孩子也不放过。”总之，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不算太多。结合他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部小说里对极权制度的犀利归纳，我们不得不感叹他超凡的洞察力。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于情有可原的理由，瞧不起当时欧美世界的任何政客和知识分子，唯独对奥威尔认同有加，并在作品里加以援引。奥威尔在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提及“新话”体系里的一种“脸罪”，即“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古拉格群岛》在提到某人因为“在教员休息室指着《真理报》上印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而获刑五年时，索尔仁尼琴不忘说明一句：“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但是，索尔仁尼琴本身就是群岛中的资深囚徒，后来为了写作又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有条件了解极权统治的种种微细之处，奥威尔甚至都不曾坐过牢，他哪来如此真切的想象力？据说，奥威尔在伦敦时，有一次为了尝尝与穷人一起在监狱里过圣诞节的滋味，故意装醉鬼辱骂警察，谁知警察听出他的高贵口音，拒绝上钩，只是劝他回家。来自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对照更能说明问题，海明威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加入的还是奥威尔始终逡巡门外的国际纵队，但海明威似乎满足于炫耀自己的受伤经历来吸引姑娘们的注意（且不说他关于受伤的描述与事实大有出入，他声称自己1944年第一个走进解放了的巴黎，更是信口开河），更重要的是，在奥威尔发现了极权体制之恶的地方，海明威茫无所感，哪怕他一度拥有更好的观察条件。

奥威尔看透宣传的把戏时，也就同时洞悉了极权的秘密。

奥威尔发现：“战争最可怕的一点在于，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口号、谎言和仇恨总是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奥威尔在当时的报刊上发现了大量谎言，他表示：“要是想收集这些报道言论，我可以填满整整一打书。”“所有的新闻稿都是那些远离战场的记者杜撰出来的，这些虚假新闻不仅存在事实性错误，且根本就是记者刻意歪曲。一如往常，只有一面之词被允许传递给大众。”这种虚假宣传甚至达到这种程度——他在《西班牙

牙内战回顾》里写道：

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的报道居然跟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连谎言与事实的那种关系都没有。我看到报纸上报道了大规模的战斗，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而对战事激烈、数百人死伤的战斗，报纸却一声不吭。我看到英勇作战的部队被报纸诬为胆小鬼和叛徒，而一枪未发的部队却被报纸欢呼为虚构大捷的英雄，……我看到，历史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写就，而是根据按照各党派的“路线”应当发生的事件写就。

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寇并作出重大牺牲的国军，不也有过类似诋毁吗？同时，我们不也曾对八路军的若干小规模战斗大加夸饰，将对日军一支辎重部队的偷袭命名为“平型关大捷”吗？（详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中“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一文）。《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读者，也会想到小说里出现过的经典情节：《动物庄园》里那个影射斯大林的“拿破仑”，在与潜逃的“雪球”（喻指托洛茨基）的争斗中，随心所欲地篡改着历史；同时遭到篡改的，还有小说里的“七诫”（相当于动物庄园的“宪法”），如“凡动物一律平等”后面，随时可以偷偷加上“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的限定语，涵义彻底相反，口气之坚定却一仍其昨。如奥威尔所说，极权体制的怪诞勇气之一，就是敢于将“二加二等于五”宣布为真理，同时将敢于声称“二加二等于四”的人关进监狱。《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从事着一种天天修改历史的职业。在老大哥的国度“大洋国”里，历史不再是一门有关事实、真相的学科，而是一个可以随意把玩的魔方，一份份宣传部门接受的工作订单。一个人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不再取决于他做过或没有做过什么，而仅仅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气候，众所周知，总是会变的。总之，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就是历史的唯一功能。实际上，文学艺术的功能，亦复如是。

“只消喝一口海水，大海的滋味也就可以知道了。”（索尔仁尼琴语）奥威尔仅仅在西班牙观察了四方左右、留意了多种报纸，再用自己出色的大脑一琢磨，他对极权体制的认识就一步到位地走向了准确。奥威尔的敏锐尤其表现在这一点，即发现极权体制的一项嗜好：热衷于为公民安排精神食粮。乍看之下，这类安排类似父母替孩子准备保健食品，细想又全然不对。父母替孩子安排，总是为孩子好，而那些替民众安排精神食粮的人，则是为了自身统治上的便利，当自身的安适与民众的心灵健康发生冲突，他们并不在乎把毒药发给民众，把解药锁入深宫。作为对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判例里曾明确宣告：“任何对表达的预禁制度，本庭会大幅偏向于假设它是违宪的。”（《美国传媒人的法律读本》第 105 页）

由于围绕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充满了谎言（奥威尔告诫道：“我只想说一点：别相信你读到的有关西班牙政府方面内斗的任何东西。不论其来源是什么，那些东西全是党派宣传——也就是说，全都是谎言”），所以，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曾多次向读者作出类似表白：

我再次重申，我在此处以及其它相关内容的叙述上不可避免地会与真相有所出入。由于缺乏非政治宣传性的文件记录，很难准确地描述西班牙内战。我提请大家，我的叙述存在偏见和错误。我已经尽可能做到诚实。

这是精纯的知识分子态度。也许与奥威尔见惯了口号式宣传有关，他不会把对极权制度的愤怒转化为高调的谴责或机智、轻松的格言，他不允许自己放纵激情。他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怀有一种对严格的真理的激情”（保罗·约翰逊语），对服从于政治的“真理”充满厌恶。和军事统帅一样，知识分子的成色理应由其判断力来验定，奥威尔恰在这方面高出众侪。在奥威尔用文字向极权宣战之时，应者寥寥，以至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动物庄园》都辗转了多家出版社，方能出版。英国著名左派出版家维克多·高兰茨曾

与奥威尔签有协议，拥有奥威尔作品的优先出版权，但他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先后拒绝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动物庄园》。当他后来听说了《动物庄园》的庞大销量，不知是否有点心痛。奥威尔在世时，他已见到了该书的德语版、乌克兰语版、葡萄牙语版、波兰语版、丹麦语版、波斯语版、荷兰语版、意大利语版、法语版、瑞典语版及挪威语版。他预计西班牙语版、日语版、韩语版、现代希伯来语版以及多种印度语版也在翻译中。另一位出版人金斯利·马丁在拒绝奥威尔时，竟然以一种泯灭善恶的机械公平感辩解道：“在抗德战争期间，我不能发表奥威尔的文章，就如同我不能发表戈培尔的文章。”事实上，人们是在若干年后发现极权制度日益逼近奥威尔的描述时，才恍然大悟，并以一种迟来的敬意，向奥威尔感恩。

谈论奥威尔与谈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常常是一回事。正是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学声誉和知识分子声誉。就本书侧重的主题“知识分子写作”而论，我们原本很难将小说纳入其中，如你所知，小说不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合适载体。有时，一部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作品，会起到知识分子作品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甚至，还推动了一场战争，解放了一群黑奴，著例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个例子如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这本小册子对美国独立战争的作用相当大，乔治·华盛顿作战前动员时，就叫人朗读《常识》和《美洲危机》系列文章，以激励士气。但《常识》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品，因为“作为一名语言大师”（《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导论”。注：《美洲危机》系列第一篇开篇写道：“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在这场危机中……”，虽然正确，但宣传鼓动意味很浓重。？？）的潘恩拥有太强的主观倾向性，立场是预定的，鲜明得容不下任何异议。这是一种一往无前、意欲碾碎一切反对意见的思想，虽然激动人心，日后看来也符合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但这种无视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写作，本身却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准则相违。知识分子写作的界限是：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看法，但不能以真理自居，更不应该禁止反对意见发声。知识分子写作不应占据一个道德或政治高地，而是从一开始就做好进入思想阵地并与反对意见进行正面交锋的准备，他的意见必须

向一切可能的异议敞开，并愿意在接受公共质询的前提下完善或夯实；如果遇挫，就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误。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特殊工作，它不一定比其他写作更高贵、更有效、更能推进人类的进步，它也不会让你高出其它知识人一头，它只是让你更像一个知识分子而已。

但奥威尔也有点特殊，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出版审查，他未必会选择这种体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尽管体裁上属于寓言小说，表达的却是奥威尔的知识分子雄心。假如当时的出版环境允许奥威尔畅所欲言，我们可能就读不到《动物庄园》了，奥威尔或许会选择距离目标更直接的方式。我们猜，那也会是更合乎知识分子写作标准的作品。

根据奥威尔致友人信，我们知道他是在 1943 年构思《一九八四》的（实际执笔则在五年后的 1948 年），1943 年他还开始了《动物庄园》的写作。当时背景是，苏联红军正与英美军队携手抗击纳粹德国，奥威尔写作之际，“西线无战事，”苏军与德军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即所谓“东线”）进行着绞肉机般的搏杀，苏联从军队到人民都付出了惨重伤亡；同时，胜利虽不确定，曙光已然出现：《动物庄园》那个还算和谐的结尾，即是呼应当时刚在德黑兰举行过的三巨头会议。德黑兰会议不仅确定了英美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还对战后处罚德国的方案作了初步商讨。在这个节骨眼上，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公然嘲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确乎有点不合时宜——他写作《一九八四》时就没有这份“不合时宜”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东西方世界的“铁幕”初步成形——执拗的奥威尔认定自己没错，他在《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言里写道：“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但他也不得不替作品的出版预作打算。据说，为了盟军之间合作顺利，美国军政府查封了大量乌克兰语版的《动物农庄》，并转交苏联官方。根据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统计，共计被收缴了 5000 本，以至奥威尔一度打算自己出钱来推广《动物庄园》。

奥威尔视极权体制为人类的共同威胁，这份致力于公共安危的信念赋予了《动物庄园》

和《一九八四》的知识分子底色。小说纯出想象，但不是人们寻常挂在嘴边的以天马行空为特征的诗人式想象，奥威尔的想象系由精密的逻辑齿轮来驱动。读两部小说，人们不是赞叹他想象力之奇崛，而是折服他预见力之精确，有时，我们忍不住怀疑极权制度的设计者借鉴了奥威尔的创意。诚然，奥威尔也会笔尖打滑，写出某些不太可能的情节，比如，他替真理部安排了一个“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目标读者则是无产者，就不太可能。他疏忽了一条界限：低劣的酒不同于低劣的色情文学，后者属于思想，而思想必须专一，任何可能引发胡思乱想的内容，都会对思想的齐一化构成威胁。在极权者看来，思想（包括念头）是一项国营产业，是一种理当像古人对待食盐那样实施国家专控和专卖的产品。读者或会想起当年对色情文学《少女之心》的全国性封杀，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第二次握手》，小说压根谈不上色情，作者张扬先生只是竭力再现了一种相当纯洁的爱情，然当局仍如临大敌。他们担心什么？说不清，但他们肯定认为，容忍读者的心旌处于某种摇荡状态，定会对执政者的统治利益有所波及。正是后一个莫须有理由，使《第二次握手》一度成了高风险的禁书。盖色情是个刺激字眼，确保民众少受刺激则是有关方面的神圣职责，他们倘能联想到以色列人种植蔬菜时发明的滴灌式浇水法，大概也会着手推广滴灌式授精法，以便最大程度地去除生育功能所附带的娱乐性。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曾广泛入选语文教材，其中有个比喻“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亦遭到删除，理由不难想见。控制思想最好“从娃娃抓起”，为了确保民众日后规行矩步地走在当局划定的思想斑马线内，就必须将任何可能失控的念想扼杀在萌芽中。因此，大批量生产廉价色情小说，在现实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奥威尔《一九八四》里那个虚构的大洋国，实施一种全面谎言的机制，即“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虽是一种犀利观察，但多少有点夸张。因为，以做事不计成本著称的极权体制，终究仍会遭遇成本问题，成本不仅指物质，还指人的心理和记忆

力，它们多半是不可控的。故极权体制下的谎言不在于全面性和彻底性，而在于原则性。即，原则上，重大事项必须确保符合党的即兴而多变的要求，至于操盘手是用削足适履还是空中楼阁的方式来完成这项要求，则仰仗同志们的智慧。如果他们有时显得诚实，也是成本使然，重要的是，他们有权撒谎，而你并不知道他们何时使用这个权力。加上一点谎言的真相，就像加进一点苏丹红的咸鸭蛋，不仅看上去更加诱人，还可能更加可口。培根说过：“搀上一点伪说的道理总是给人添乐趣的。”再说，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喜欢真相，人们总是偏爱自己喜欢的东西。极权体制虽以无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著称，但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在谎言艺术上的非凡造诣。

除小说外，奥威尔也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不乏堪称知识分子典范的文字，如写于 1945 年的《为 P.G. 沃德豪斯辩护》。沃德豪斯是一位英国作家，德军 1940 年初夏穿越比利时，顺便把他掳走了。他曾长期在德军监视下居住，“从他后来发表的声明看，好像德国人对他还不错，附近的德国军官时常‘到他家里洗个澡或者开个舞会’。”随后，他应德国人之邀，公开发表了一些符合德国人期望的言论，但好像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在伦敦上空一度布满德军飞机之后，群情激昂的英国人，难免依照某种战时的阔略化手段，把沃德豪斯说成一个“卖国贼”。按说这没什么问题，战争年代嘛，人们总有特别多的仇恨需要宣泄，特别多的危机需要转嫁，特别多的正义需要声张，对有些人，恐怕还有特别多的利益需要攫取，而人们能够在大脑里调用的理性资源，通常又特别稀少。显然，一个看上去符合仇恨标准的人，如沃德豪斯，就能同时满足上述需求。我们对周作人、胡兰成辈，也曾有类似仇恨，而周、胡也很难把自己完全漂白。

奥威尔从来不是一个对纳粹德国有好感的人（他曾念念不忘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一个任何时候都拒绝将大脑出租给形势的人，一个任何时候都不愿放弃独立思考的人。他不为汹涌舆情所动，认真研读、分析了沃德豪斯的言论，尤其侧重于结合时代背景和沃德豪斯个人的心理特征（奥威尔少年时代即读过沃德豪斯，共计读过这位作者三分之二的书，不少于 30 种），得出了相反意见。在这篇

文章里（见译林出版社《政治与文学》一书），奥威尔以特有的冷静、从容，辅以扎实细密的案头工作，替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同行进行英勇的辩护。他认为沃德豪斯只是一个糊涂虫，他出语谨慎地写道：

假如我对沃德豪斯心理的分析是对的，那么，认为他在1941年有意资助纳粹宣传机器的说法就站不住脚，甚至是荒唐的。他可能是因为想提前出狱而上了当，但是他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做法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不用说，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意见。公然与一边倒的鼎沸舆论作对，那是任何一个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文人学士都不愿干的傻事，奥威尔却这么做了。与埃兹拉·庞德和约翰·埃莫里等名头更响的“卖国贼”相比，沃德豪斯只是个小人物，但唯其如此，奥威尔的声音就更加独特。事实上，奥威尔并非在一个注定会引来大量关注的话题上“反弹琵琶”，他深入民主的细节，像一位正在做脑外科手术的大夫那样进行写作，他要求自己在细微之处捍卫人的权利，他不允许个人权利被某种正义的宏大声浪所涡卷、吞没。——不过，幸亏他生在英国，若在某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他这种态度即使不受到官方惩处，也会淹没在民众的唾沫中。民众的正义感往往取决于一个标签，只要自认属于爱国者阵营，他们并不介意把任何与自己意见相左者往死里打。毕竟，“于细微处见精神”（鲁迅语）是一种精细活计，普通人对此难免不耐烦。

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里，奥威尔针对英军用铁链锁住德军战俘一事，再次勇敢地发表了异议（可惜，那封信最终未获登载）。英军虐待德军战俘，原本事出有因，是德军虐待英军战俘在先。但奥威尔再次着眼于细微，他提醒国人留意“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正告英国人竭力避免任何“与敌人同流合污”的行为，他写道：“假如我们总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行事，定会使人们慢慢忘记这些差别。”伟大的知识分子往往共有某种正义基因和行为操守，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自己的国家被德国

人占领之后，曾在1943年的《自由杂志》上发表过几封《致德国友人的信》，内云：

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正在为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而这种细微思想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为这务虚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这是将牺牲精神与神秘主义、将力量与暴力、将能力与残忍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我们为这种特别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因为这是将真与假、将我们希望的人与你们所尊敬的怯懦的神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每一位自以为重要或不甘寂寞、好出风头的知识分子，都会热衷于展开宏大叙事的笔墨，或参与若干群体签名类事件，或加入游行队伍并力争走在队伍最前面（罗素、杜威、萨特等人乐此不疲），而如奥威尔、加缪等凤毛麟角的精英，则选择默守书斋，专注于那些弥足珍贵的“细微思想”。他们的声音在当时总是不那么响亮，时过境迁后，则会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

或可顺笔提及知识分子的三种依赖路径：较常见且极易令人不屑者，是依附政府或权贵，这号人物距“社会良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最远。第二种路径是刻意当反对派，其中又可粗分两种，一种是伪反对派，他们只是由于自身所属派别暂时处于在野状态才成为反对派，一旦拥有权力，也可能立马与掌权者交叉换位；另一种是不党不派，专以批评、监督政府为己任。后一种人物中可能诞生优秀知识分子，但如果他的反对态度过于“蓄意”，也会损伤其言论品质，并最终把他还原为凡俗之辈。第三种路径则以取悦大众并以民众代言人自居，由于他们持续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他们确实这么做时，或者，当他们得到民众认可时，就可能名动天下。尽管，准确地说，他们更像道德英雄而非知识英雄，或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形容的，只是些擅长调动民众情绪的“多愁善感的人”。

奥威尔失之简单且政治先行的文章也为数不少，读者并非都能认同。我们痛恨极权体制是一回事，将文章弄成另一种“政治挂帅”，又是一回事。约翰逊博士好像说过：在作

家活着时，人们用他最差的作品来评价他，当他死去，则以他最好的作品来评价。偏颇中自有公道。小见以为，最能展示奥威尔知识分子品质的文章，是他写于1946年的那篇《政治与英语》。在这篇字字珠玑、浓缩了大量思辨精华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他将思想与语言的因果关系，言简意赅的表述为：“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奥威尔首先向当代政治语言问责，他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演与政治写作多半都是在为不可辩护的东西做辩护。对英国继续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俄罗斯的大清洗和大驱逐、在日本扔原子弹这类事情，的确可以辩护，但是，辩护所用的论据，必定是极端残忍，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无法面对的，并且是跟政党所宣示的目的不相符合的。所以，政治语言不得不主要由委婉式、祈求问题式和纯属云山雾罩式的说法组成。”他对人们偏爱的某类大词的分析，也极益心智，“像‘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正义’这样的词，都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各种含义相互并不相容。比如‘民主’一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各方面也反对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大家普遍感觉到，如果我们说某个国家是‘民主的’，那就是在夸它；因此，为各种政体辩护的人，都宣称那个政体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一旦‘民主’一词的含义被确定下来，自己就不能再使用这个词了。”这实在太有道理了，试想，假如“民主”的含义就像“微处理器”、“自行车”那样固定，我们肯定不会听到“中国式民主”的说法了，因为那就像“中国式自行车”一样荒唐。记得有位歌唱家声称要创造一种“中国式和声”，话音甫落就收获了一堆笑柄。

“政治语言的目的，”奥威尔继续写道，“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这一点，对于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所有政党来说，都是适用的，只不过各自的程度稍有不同而已。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且，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大声地嘲笑那些过时而无用的短语（诸如‘高压统治’、‘阿喀琉斯之踵’、‘温床’、‘熔炉’、‘严峻考验’、‘十足

的地狱’等等），我们还能逐渐地将它们扔进垃圾箱。”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临时工”、“七十码”等官方语汇发出的集体嘲讽，不也曾使某些人有所忌惮吗？奥威尔猜测道：“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语言，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由于独裁统治的缘故，已然退化了。”他虽然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予以确认”，但我们这些多少有所感触的人都能证明他所言不虚，索尔仁尼琴曾在车厢里与某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攀谈，最后他发现，“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对此我们同样感触满满。

为了避免退化，奥威尔在文中向自己——也向他的读者——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个审慎的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每句话，都至少要问自己四个问题：我想要说些什么？那些词能表达哪些意思？用哪些成语或者比喻能使意思更清晰？这些比喻是否足够新鲜、能在读者脑海里留下自己所希望的印象？他也许还会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能更简洁地表达它吗？我是否说了本可以避免的丑陋的话？

我们不能确认，只要照方抓药，当代语言的病态就能重获生机，但我至少可以肯定，转机就在其中。最后，让我们再聆听一下奥威尔的高论，以便知所鉴戒：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



【封面】

天堂之门

照片选自 19 世纪法国版画家古斯塔夫 · 多雷 (Gustave Doré) 为但丁《神曲》之天堂篇所配的一幅插图。所谓个人崇拜，便是将普通的人化为一种宗教式的神，并许诺所有人一个完美而遥远的天堂般的乌托邦，来攫取他们的信任和权力。这幅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版画完美的呈现了一种宗教式的诱惑以及吸引，与毛时代由于各种宣传所造成的个人崇拜在内在机理上暗和神似。在《神曲》的天堂篇，但丁终于与上帝得以相见，但上帝的形象在一闪过后瞬间消失，而所有的幻像和神曲也戛然而止。这一充满寓意的结尾，也符合个人崇拜这种真面目及其结束。（邹行） ■

【读者来信】

1. 小鹰答余汝信

《记忆》215期读者来信里，余汝信指出“《文革问答三》一文，引用的有关张霖之材料不确”。

我以前读过高晓岩写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余文误为96年）。这位记者当年采访的对象是刘源与何家栋（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顾问），且於文前郑重说明“刘源、何家栋审定了文稿。”

后来我也见到过余汝信写的《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因为戚在其回忆录里也引了有关张霖之的这段内容。其中余认为“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走资派）！’”这句话，是1998年高晓岩上述文章“编造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证实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故“戚是拾人牙慧。”

他《指谬》的“根据”及逻辑与这次的《纠误》基本上相同，即：“文革期间，无论

是中央、中央文革的什么人(包括戚本禹本人)，有谁引用过毛泽东这句话吗？没有！群众组织编印的所有毛的讲话集中有这句话吗？没有！查遍所有中央文件，有这句话吗？更没有！”但我引用时，对余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毛说过的话，特别是许多“对话”，不是正式“讲话”，并非句句都要被“中央”引用过，或一定要有录音或文字记载，才算数；何况许多中央档案到现在还没有解密，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没有呢？故余仅以此便断定记者“编造”的说法，不足为凭。

事实上，高晓岩的采访并非孤本。1998年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央视电视片《刘少奇》的总撰稿人黄峥对王光美也作了采访。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峥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由彭佩云作序。我在《“文革”问答三》中援引的内容便取自这里。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月的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王光美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会议期间毛、刘有过如下一段激烈的对话：

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王光美当时因正搞“四清”，曾被邀参加过65年1月3日那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但她坦言，对这种白热化的争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而根据高晓岩的采访，这件事是刘源在文革中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所讲述的，且“文革结束后组织部长安子文也对刘源追忆了整个事件的见闻”。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可信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作这样的“编造”。

而余汝信提到毛点名王鹤寿的事是在1964年12月20日，毛当时也并未明确说他就是

“走资派”，且王鹤寿被罢官是早在 64 年 4 月。王鹤寿原是冶金部长，张霖之是煤炭部长，除了“部长”职务相同之外，这里所说到的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完全两样，很难“混同”或“误记”。故“余说”虽有讲话记录可查，但子之“讲话”确有，并不可证明彼此“对话”绝无。

不过，这事件的要点并不在于张霖之是否是“走资派”，而是表明那时毛、刘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公开激烈化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用他的社教 23 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否了刘的四清 17 条（“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从此，以打倒“走资派”为宗旨的毛“四清”，以及后来的毛“文革”，就这样开始了。

至于戚本禹等，因当时级别太低，远无资格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可能的确不知有此毛刘斗嘴的内容，但他和江青在文革中用类似的毛语录，强加以“官僚”和“走资派”等罪名，来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斗张霖之致死一事，是证据确凿的。（参见张霖之之子张光渝所写的《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戚本禹认为，当年没有彻底打倒包括张霖之在内的走资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现在很多人其实也是他的这个观点。文革结束四十多年了，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文革”？什么是“走资派”？“走资派”究竟对不对？却还总是持守当年江青、戚本禹整死张霖之时的煽情口号——“他们是‘民愤极大’的‘死官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我感谢余汝信关注拙作，并欢迎读者更深入地批评讨论。《记忆》读者间能有些互动往来，真的很好！■

2. 郭世杰正误：杨忠立的籍贯不是固城县，是城固县

贵刊第 198、199 期刊发了空四军原第一付参谋长杨忠立写的交待材料。对研究“九一三”之后的部队清查，很有意义。但是，文中说杨忠立先生的籍贯是陕西省固城县。陕西没有固城县，只有城固县。特此纠正。■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 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